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李大钊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中华名人传记

李大钊传

余光荣 编

目 录

第一章	勤学矢志.....	002
第二章	传播“马列”.....	014
第三章	“五四”时期.....	026
第四章	建党前夕.....	044
第五章	“二七”风暴.....	063
第六章	联合战线.....	083
第七章	“五卅”前后.....	096
第八章	精神不死.....	113

第一章 勤学矢志

在那广阔的冀东平原东端，濒临波涛澎湃的渤海，紧靠着改道前的滦河，有着一望无垠的田野和一片一片错落有致的村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就诞生在那里——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那一天是——公元1889年10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阴历十月六日)。

李大钊从小孤苦伶仃。父亲李任荣是个读书人，早年因患肺病，在他出世前就已逝世。母亲因感伤过度，在生下他后不到一年半也即去世。

李大钊是由其已是古稀之年的老祖父李如珍抚养长大的。正如他后来自己所说的：“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李大钊祖父也是读书人，开过杂货铺，有近百亩地，因无儿子，将侄儿即李大钊父亲过继为子。

李大钊在一心想把孙儿培养成能光宗耀祖的读书人的老祖父严厉督促下，3岁起就在祖父的启蒙下学着认字，5岁时就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书。

李大钊自幼就以勤学、刻苦而著称乡里。7岁时，

祖父送他到附近的黄瓜口村一位叫单子鳌的私塾里去读书。由于他学前受过祖父的启蒙，所以一入学就跳过蒙学阶段，和大孩子们一起读“四书”。他读书非常认真，虽然年龄最小，但却是最用功因而也是学得最好的一个。塾师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用功的小学生。直到后来，常对人说：“我教了一辈子书，生平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李耆年(这个学名是塾师给取的，耆年，是长寿的意思)！”

李大钊学习进步很快，在黄瓜口村念了3年，塾师单子鳌对他祖父说：“耆年的学业良好，我已经教不了他，还是另请名师吧！”

李大钊后来又先后从学于小黑坨村的一个秀才赵辉斗和井家坨宋举人家一个叫黄玉堂的先生，直至考入永平府中学。

在井家坨读书时，李大钊越发刻苦努力，每天读到半夜。老师常说：“有个学生，叫李耆年，念书念得特别好！”

1925年，本想报考秀才的李大钊，正赶上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的所谓改良，结果考进了永平府中学。当时，村里人仍把他当作考中秀才那样，放铁炮、贴报单、坐棚车，热闹了一番。进了永平府中学，李大钊仍是勤奋好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李大钊的少年读书时代，正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

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时代。5岁时，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11岁那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冀东各地普遍建立了义和团组织。不久，八国联军侵至乐亭附近，占据了昌黎、滦州等地。帝国主义的蛮横侵略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斗争，在李大钊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常常问他的老师：“为什么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衣穿？”从那时起，他就憎恨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憎恨残暴的封建制度，憎恨腐败的清政府。特别是在13岁那年，他听了黄玉堂老师讲了太平天国的故事后，激动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从此，他决心发愤读书，寻求救国救民之良策，来挽救祖国于危亡之中。正如他后来在《狱中自述》中所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在永平府中学两年的学习中，李大钊进一步表现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常常和进步同学一起讨论国家大事，接受新思想，求读进步书刊，手不释卷地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

本来，李大钊的祖父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光耀门楣的读书人，但他正在沿着一条爱国、救国的革命道路摸索着前进了。

1907年夏天，李大钊与几个同学一起去天津报考学校。当时，天津有3所学校正在招考：北洋军

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一心期望着为祖国寻找出路的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决定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此后，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6年的学习生活中，积累了广泛、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革命理论，为追求真理，确立爱国救国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李大钊所在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辛亥革命前就已有革命党人在进行活动了。1910年11月间，法政学校为要求政府开设国会而举行了罢课斗争，促使李大钊进一步倾向革命。

当时，法政学校有个史地教员叫白亚雨，他在辛亥革命时参加同盟会，是同盟会京、津、保支部的重要成员。白亚雨学识渊博、待人热情，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辛亥革命爆发后，白亚雨积极为革命奔走，领导发动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英勇不屈，最后壮烈牺牲。就义时，立而不跪，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白亚雨老师的革命思想和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使年青的李大钊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进一步坚定了李大钊献身于革命的意志，也影响了一批有革命倾向的青年学生。李大钊对这位为革命献身的老师非常尊敬，多年后，一再在文章中悼念不已。

1912年6月，李大钊写了一篇《隐忧篇》的文章，为辛亥革命后政治局势的发展，为新的共和国感到“隐忧”。这是李大钊最早的一篇文稿。李大钊怀着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积极投入当时沸腾的政治生活。他曾于1912年冬天，去北京摸索革命道路，接触了一些政界人物，还同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有过交往，但都使他感到失望。他还曾“慷慨思投笔”，而又“艰难未去师”。这一切，使他深感找不到出路，国事日非，仕志难酬。他在这期间还写下了不少诗文，表达了满腔的忧愤。当时的革命果实已被军阀篡夺，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的他，不仅是“隐忧”，而是要大声疾呼自己的哀痛了。他在学校里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就在1913年4月1日的《言治》创刊号上，他发表了激愤的《大哀篇》。在文章中，他痛击军阀官僚政治，深切关注人民命运，指出：“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狴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之安享之幸福也。”“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革命果实，“此辈肥而吾民瘠矣”。“以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

火，天灾乘乘，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

此后，政治形势日趋恶化。1913年春，国民党进步人士宋教仁遭到袁世凯暗杀，紧接着，帝国主义五国银行团与袁世凯成交了所谓“善后大借款”，使反动势力更加疯狂，准备向民主派开刀。李大钊指出，窃国大盗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暗杀”与“借款”使国家更“危机万状”，民权“旁落”。忧国忧民的李大钊，迫切地希望找到一条出路。

1913年暑假，李大钊结束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业，毕业后，又去北京。这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的“二次革命”由于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只靠单纯的军事行动，导致“讨袁”失败。与李大钊有过交往的社会党人陈翼龙也在8月间被袁世凯杀害。曾寄期望于“二次革命”的李大钊，为此感到愤慨和痛心，加之袁世凯专制独裁的迫害，他离开北京，暂返故乡，筹划出国去日本留学。

在回故乡的途中，李大钊两次登五峰。那个地方，他在天津读书时曾和朋友们去过。旧地重游，追思逝去岁月，瞻念祖国前途，不禁感慨万端。9月11日夜，在当地又发生了一起日军惨杀我5名铁路职工的血腥事件，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他向同胞强烈呼吁：“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

从故乡回到天津不久，他又看到日本帝国主义新出版的一本反动书籍《支那分割之命运》，立即写了数万言的《驳议》文章，驳斥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的谬论，“字字皆薪胆之血泪”。同年12月，《驳议》就出版了，并很快“风行全国”。

从1913年4月至11月，李大钊写下了战斗诗文近30篇，已经由一个普通的爱国学生成长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了。

1913年冬天，李大钊在友人汤化龙等资助下，东渡日本。出国前，他在纪念友人郭厚庵的一首七律诗中，透露了对祖国命运的无限关切：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熏。
去国徒深屈子恨，清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李大钊到日本后，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他在留学生中结识了很多朋友，常常同他们谈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題。虽然看起来他外貌很淳朴，不善多讲话，可一谈起天下大事来，可谓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还在学校的留学生中组织了5人经济学会，并已开始研究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

的著作。同时，他那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写了很多具有强烈战斗精神的文章，鼓舞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从针砭时政进而尖锐地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封建军阀的卖国行径。

他去日本学习时，正是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的时候。1914年，他在日本发起组织神州学会，团结进步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反袁秘密活动。1914年11月，李大钊发表了《国情》一文，揭露帝国主义与袁世凯相互勾结的阴谋，痛斥袁世凯顾问古德诺、日本首相亲信有贺长雄的《新约法论》等亲袁称帝谬论，揭穿了袁世凯公布“新约法”准备称帝的阴谋，并告诫人们，不要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抱任何幻想，不管它是欧美的或是日本的。这篇文章，是我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它在袁世凯称帝的一年前，就及时地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严防窃国大盗的信号，表现了李大钊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敢于向反动派作坚决斗争的大无畏精神！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袁世凯想当皇帝的迫切心理，向袁世凯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交换条件，这个消息在报上一透露，立即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我国的留日学生群起反抗，迅速召开留日学生总会会议，反对订立卖国条约。公推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

文牍干事，起草通电，他连夜写成《警告全国父老书》。这篇激昂慷慨、脍炙人口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对当时的反日爱国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承认“二十一条”。权欲熏心的袁世凯，为了要过皇帝瘾，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于5月9日全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6月，李大钊又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并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激励全国人民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在《警告全国父老书》和《国民之薪胆》两篇文章中，李大钊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历数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强盗行径，号召国民奋起自救，敌人有强暴的陆军，我们有不怕牺牲的血肉；敌人有坚巨的战舰，我们有团结战斗的决心！“勿灰心，勿短气，勿轻狂躁进，困心衡虑，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一定能保卫“锦绣之江山”，一定能击败凶恶的敌人。

在这次爱国斗争中，李大钊成了闻名一时的人物。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反袁派起兵，接着全国各地响应，将维护民主的反袁运动推向高潮。这时的形势正如李大钊所述：“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李大钊所在的留日学生总会，积极支持云南的“护国军”，并代筹军饷，又推举李大钊为文事委

员会编辑主任，开展宣传活动。为了反袁，李大钊于1916年1月返国。在途中船上，他写下了雄壮的诗篇：

浩淼水东流，客心空太息。
神州悲板荡，丧乱要所极？
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
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
绝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
中宵出江户，明月临幽黑。
鹏鸟将图南，扶摇始张翼；
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
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
男儿尚雄飞，相失不可得。

李大钊于1916年2月初到上海，两周后即返日本，与几个朋友住在东京郊外高田村的月印精舍。就在那里，他继续专心致力于反袁工作，并开始写作呼唤人们“再造中华”的《青春》一文。同时，他为留日学生总会编辑《民彝》杂志，准备出版，并与杜国 等筹划组织“丙辰学社”。

在1916年5月15日出版的《民彝》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民彝与政治》一文，对“大盗窃

国，予智自雄”的袁世凯进行了猛烈抨击，进而批判了为封建宗法制度服务的政治文化。并庄严宣告：“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应“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命运，始有成功之望也”！

1916年春，李大钊在日本写完了《青春》，寄给陈独秀，发表在当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二卷1号上。从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李大钊的思想和文风有了更新的进步。在他以前的诗文中，于慷慨激昂中时有悲凉的气氛，而在《青春》中，多半表现出了明快而雄壮的气势，思想清新，色调鲜明，这是一篇五四以前革命民主主义的宣言书，对前期新文化运动起着重大的影响。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对宇宙，对人生，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看法，表达了明显的唯物主义思想，歌颂了积极进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它号召青年们要“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要“乘风破浪”地前进，“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这篇文章和他以后在1918年春天发表的《今》、《新的、旧的》等文章，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又充满了辩证法的因素，

为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为了促使袁贼灭亡，李大钊未等到毕业，就于1916年5月提前回国到上海，投入火热的反袁斗争。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下，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袁贼，仅仅做了83天的皇帝梦，就于1916年6月6日一命呜呼了。

1916年春，李大钊在日本江户送友人幼蘅回国的时候，就对当时的反袁斗争充满了胜利的信心，曾以无比的热情口占一绝：

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

第二章 传播“马列”

1916年6月，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应汤化龙等人的邀请，到北京去办报。他也期望能够通过办报传播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想利用报纸，使它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于是，他决定到北京去了。在途中，他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为报纸的出版精心地筹划着，在碧波滔滔的海上，对着喷薄欲出的朝阳，他为报纸想好了名字：《晨钟》。他想振此“晨钟”，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担当起“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使命！

经过2个月左右的辛苦筹备，《晨钟报》在8月15日创刊了，由李大钊担任总编辑。在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副标题为“青春中华之创造”。李大钊把创造“青春中华”的希望，寄托在青年的觉醒上，“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在《晨钟报》上，李大钊宣传民主主义思想，介绍民主主义的思想家，继续反对封建专制独裁，揭露当时军阀、官僚、政客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罪恶行径。

其实，研究系汤化龙等人约李大钊合作办报的目

的，不过是想利用李大钊的文名，为他们装点门面，收买人心而已。由于李大钊与他们有过关系，而这帮政客在袁世凯快要垮台的时候也曾经投机反袁，李大钊未能看穿他们的本质，加上汤化龙曾资助他出国留学，所以才去与他们合作办报。随着时局的发展，李大钊抨击军阀的言论越来越激烈，渐为研究系政客所不容，李大钊为《晨钟报》撰写的文章竟一再被汤化龙左右的人擅加删改，很难完整发表，而且研究系政客甘当军阀工具的面目日渐暴露，也为李大钊所不容。这样，关系终于破裂，李大钊很难在《晨钟报》继续工作下去了。他宁愿失业，也不愿向旧势力妥协，毅然辞去总编辑的职务，在9月4日的《晨钟报》上，发表了他的小说《别泪》，9月5日，发表了辞职启事。在辛勤编辑22天后，终于离开了他亲手创办起来的曾寄予很大希望的《晨钟报》。

1917年1月，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在北京创刊，李大钊受聘为编辑。他不顾章士钊的劝告，在《甲寅日刊》上又发表了许多反对军阀统治和反对封建文化的文章。特别是对孔教的批判，不但很激烈，而且很深刻。他认为“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孔丘之说代表封建“专制社会之道德”，“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

1917年7月上旬，落后的旧中国，又上演了

一出“张勋复辟”的丑剧。李大钊在“张勋复辟”之日，仓促离京，避走上海。他在这个时候，“百感交集”，痛于过去革命之昙花一现，而自己10余年来“流离转徙”，还没有找到国家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心情十分沉重。正如他秋天寄给白坚武的一首七律诗中所表述的那样：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繁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江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这时的李大钊非常苦闷，因而写出了似乎消极的诗句，其实他是在探索求新的革命道路。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李大钊是中国接受马列主义的第一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开始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他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18年1月，李大钊由章士钊推荐，接替章担任了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这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教授中也有不少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人士。1915年9月新创刊的《青年杂志》，于1

1916年改为《新青年》，早已成为新文化的旗帜。因主办《新青年》而享有盛誉的陈独秀正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以前就为《新青年》写过文章，他一到北京大学，就进入了《新青年》的编辑部，并继续辛勤地搜索有关各国革命运动的材料，特别关心俄罗斯的革命问题，更深入地探讨在日本时就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他一面研究理论，写文章，一面到师生和职工群众中去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北京大学各种社会团体的名册中，大半都有他的名字，甚至连“学生游艺大会”、“学余俱乐部”他也是发起人之一。

1918年冬，他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取名为“马尔格思”的学说研究会，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个组织还没有得到发展，就遭到了“防止过激主义传播”的反动政府的查禁。由于李大钊巧妙地利用了马尔格斯这个译音，反动警察当局以为是个什么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团体，才幸免于继续追查。

1918年10月间，毛泽东经杨昌济教授介绍，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李大钊和年青的毛泽东一起，更深切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李大钊那时对毛泽东的思想，是有一定影响的，毛泽东后来曾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

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19年3月，毛泽东又回到湖南故乡开展革命工作。

在北京大学，李大钊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1918年1月，他加入蔡元培校长发起组织的进德会，6月当选为纠察员。

1918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大学公余法文夜校”，他也是一个发起人。

1918年12月，他代表北京大学图书馆参加“北京图书馆协会”，当选为中文书记。

1919年1月，他当选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会组织大纲起草员，参加临时委员会。

通过这些活动，李大钊和周围群众有了密切联系，为进一步开展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1918年6月，李大钊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6月30日在北京召开筹备会议，推举李大钊为《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经过一年筹备，少年中国学会在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会员最多时有1000人左右，在南京设了分会。学会正式成立时，经李大钊等提议，把学会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进一步提出要在科学精神指导下，达到实现“少年中国”的理想。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有以后成为共产党员的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高君宇等。其中如曾奇等

倾向国家主义的人也不少。

1918年，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中国反动政府叫嚷要防止“过激派”的形势下，李大钊根据搜集到的关于十月革命的材料，作了认真的研究，于1918年7月1日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开始阐明十月革命的实质。这比他前一年的文章进步多了。在这篇文章里，他明确地论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根本区别，指出十月革命的性质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还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行演讲会，一连讲了两天。著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了《劳工神圣》的演说，这一口号在当时起过较为广泛的影响。全世界工人运动高涨，工人阶级力量逐渐壮大，崇拜劳工的时代潮流，得以传入中国。继蔡元培演讲之后，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这篇著名的演说(后来又出版发行)，接着，他又发表了著名的论文《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文章中，李大钊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揭露了帝

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为中国人民指出新的革命斗争方向。李大钊指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必然出现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他将十月革命比做“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而由此开展起来的世界革命“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遏得住的”，一切腐朽的反动势力必将灭亡，满怀信心地宣告布尔什维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李大钊的这两篇文章，虽然还没有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但立场十分鲜明，不仅和帝国主义、军阀、官僚针锋相对，就是和蔡元培高唱劳工神圣的立场也迥然不同，它们已经是在为无产阶级说话了。可以说，这时的李大钊已经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通过幸德秋水、河上肇等人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那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和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也不可能使他立即接受马克思主义。但直到1918年秋后，世界革命的形势，中国的社会状况，使饱经忧患之后的李大钊经过深刻的反省、探索和认真的学习、研究，才终于找到了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在这个伟大的变化进程中，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

是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的。正如林伯渠后来为《李大钊选集》出版题写的诗句所说：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李大钊的演说，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月28日起，北京大学又在中央公园举行演讲大会，连续讲了3天，李大钊再一次讲了《庶民的胜利》，成为这次演讲大会的中心内容。

从1918下半年起到1919年，随着国内外形势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北京以至全国各主要城市，各种爱国团体、新文化团体和传播新思潮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由于李大钊极其热情地参加、支持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北京各团体差不多都请他去指导或当顾问。如1918年10月成立的国民社，它是由反对中日密约的学生救国会发展而成立起来的。它一开始就请李大钊任导师，李大钊不仅积极为《国民》撰稿，而且实际上是这个杂志的总顾问。在李大钊正确指导和影响下，国民社的多数成员、特别是它的骨干分子如许德珩、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在随后的五四爱国运动中成为积极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和国民社差不多同时成立的新潮社，也于

12日聘请他为顾问，并约他为《新潮》写稿。至于由邓中夏等发起、以左翼学生为主、于1919年3月成立起来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更是与李大钊关系密切。

李大钊在《新青年》二卷1号上发表的《青春》一文，在新文化运动中宣传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在1918年11月发表的演说《庶民的胜利》和撰写的论文《Bolshevism的胜利》，于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五卷5号上发表，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使新文化运动开始带上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新文化运动的前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运动，陈独秀起了重要作用；在它的后期，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李大钊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新青年》充分反映了这一变化的主流，一至三卷是陈独秀主编的，从第四卷起，由李大钊和陈独秀等轮流担任各期编辑，其中鲁迅也时常参与编辑部工作。

在新旧思潮的激战中，《新青年》进一步在群众中扩大了影响。

新文化运动提倡语体文，反对文言文，以语体文的形式进行新道德和新文学的传播。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上用语体文发表论文，文笔畅达深刻，启发了众多的读者。此外，他在还《少年中国》、《新青

年》等刊物上发表过几首清新隽永的白话诗。如他在五峰山时就写了一首《山中落雨》小诗：

忽然来了一阵烟雨，
把四山团团的围住。
只听着树里的风声雨声，
却看不清云里是山是树！
水从山上往下飞流，
顿成了瀑布。
这时候前山后山，
不知有多少樵夫迷了归路？

李大钊的这首白话诗抒写了当时自己在风雨中战斗的心情，并深切地关怀着人们不要迷失了路径，暗喻人们在革命的道路上不要迷失方向。

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与陈独秀特地创刊了《每周评论》，因为《新青年》为每月一期，且多半是长篇文章，已不能完全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了。《每周评论》登的是短文，着重批评时政，推动当前的政治斗争。这个每周一期四版的小型刊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广泛的影响，不久就为继起兴办的许多刊物所采用。

李大钊为了创办《每周评论》，不辞辛劳地奔走。

在创刊号开印那天，他亲自到报馆，细致地校对，直至印出大样，一直到凌晨4点钟。在《每周评论》创办以后的半年左右时间里，他撰写发表了55篇文章，平均每星期就发表2篇文章，可想而知，他的工作干劲是多么大啊，同时，他还担负了种种编辑上的琐细的实际工作。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中继续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1919年元旦，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新纪元》的社论，这篇文章主张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要“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2月上旬，又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战后之世界潮流》等。在这些文章中，他通过宣传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进一步阐明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

李大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他指出：“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他告诉人们：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要进行根本的变革。在新纪元曙光照耀下，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走上“新人生的道路”。

中国的反动派竭力企图阻遏革命的洪流，把布尔什维克党叫做“过激党”，诬蔑所谓“过激主义”为

“共产公妻”。李大钊立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过激乎？过情乎？》、《过激派的引线》等文章，指出：有了进步的举动，人就说是“过激”，这是社会上的一种“惰性”力量在作怪。“过激主义”是因为“社会上不满意的事太多”而产生的。但是，那些怕“过激主义”的人又何尝知道什么是“过激主义”？为此，倒不可不译几本被认为是“过激派”的著作出来，“过种书果然译出，看得见的，可就不止那几位怕过激主义的人”。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将在人民中广泛传播。

第三章 “五四”时期

毛泽东在论述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时指出：“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到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李大钊从开始认识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后，紧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五四前他连续发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评论，五四运动中，他更为有力地揭露了整个帝国主义“强盗世界”，引导中国人民认清敌人，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依附于它们的反动军阀政府，发扬不妥协的彻底的革命精神。这就从思想上对五四运动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大钊等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促使封建文化日益崩溃。一些抵抗新思潮的“卫道之士”，却还在做着垂死的挣扎。1919年3月，守旧文人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诬蔑新文化运动，企图借军阀的横暴统治来阻止新思潮的推进，他还在《公言报》上发表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公开

信，大肆攻击北京大学“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这时，《每周评论》第12期从《晨报》转载了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怒斥那些勾结封建军阀的文人：你们……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反对你们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迅速对林纾的信作了公开答复，他站在“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立场上，对新文化运动作了有力的支持。然后，《每周评论》等17和19期又先后刊出“对于新旧思潮的评论”，集中登载各报的言论，促进新文化运动更广泛地开展。

1919年1月18日，美、英、法军和帝国主义策划的“巴黎和会”开幕。我国派出的专使在会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的特权，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的权益等。但是，“和会”一开始就暴露出它的强盗分赃真面目，使我国受到极大的威胁。

在这严峻时刻，北京各学校学生，于2月初纷纷集会，提出维护国家主权的要求。2月5日，各校以北大为中心开始组织起来。《每周评论》2月9日作了报道：“北京学生联合会筹议抵抗：北大学生于5

日晚间在法科开全体大会，到会2000多人。举出干事10多人，分头进行。并联合各校学生，电致巴黎五专使……“不要让步”。

随着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逐步广泛的宣传，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在李大钊的周围，也逐渐团结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少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是他们中的骨干。

李大钊不仅在北京大学经常联系着一批爱国学生，也指导着校内外许多报刊、团体的活动。

《国民》杂志社是1918年10月成立的，有社员100多人，请李大钊担任导师。《国民》杂志创刊号于1919年1月1日出版，这个刊物连续发表了很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突出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与《国民》同时创刊的还有《新潮》，这是北京大学学生办的杂志，李大钊担任了新潮社的顾问，他不仅在出版方面给予很多帮助，还为他们撰写文章，同时，又在图书馆拨了一间房子给他们使用。五四前的《新潮》，在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文学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

李大钊还联系着《晨报》副刊。《晨报》的前身就是李大钊编辑过的《晨钟报》。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高潮即将到来之际，李大钊利用了以前和《晨

钟报》的关系，使《晨报》第7版(副刊)成为一个传播新文化的园地。1919年2月7日，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晨报》第7版开设了“自由论坛”，经常发表论述新思潮及社会问题的论文。李大钊在这上面先后发表了《战后之世界潮流》、《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劳动教育问题》等一系列政论性的文章。

李大钊当时还号召青年学生和社会团体中的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到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中去开展工作。

1919年春，李大钊调查了解到唐山煤矿工人的状况，工人们终日在坑里做工，享受不到“人世间的空气阳光”，在资本家和包工的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在这样近9000工人聚合的地方，却还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他写了《劳动教育问题》一文，指出工人的“生在组织不良社会制度之下”，资本家掠夺工人劳动果实，又夺去他们的精神生活。主张必须多设“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同时，在他写的《战后之妇人问题》中，谈到男女劳工问题，并提出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1919年2月，李大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其中着重指出：必须在农民中开展工作。应当发动农民，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

愚暗”。因为农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

李大钊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分析了有关妇女运动的问题，提出：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既要打破“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又要从根本上打破“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必须男女工人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1919年3月，李大钊发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号召青年们在“新世纪的曙光”照耀下，到劳动人民中去活动。他告诉青年：现在社会组织不良，劳动的人所得的果实，却被不劳动的人掠夺一空。我们要到最苦痛最悲惨的劳动人民中去。他初步提出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劳动人民结合的思想，推动了知识青年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群众运动中去。

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影响下，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组织了平民教育演讲团。4月起，他们在蟠桃宫、护国寺等庙会上演讲了《现在的皇帝倒霉了》、《家庭制度》等，进行反对封建文化的宣传。“五四”高潮中，演讲团配合运动的发展，到北京市民中展开了“抵抗强权”、“争回青岛”的反帝宣传活动。“五四”运动以后，他们的活动又从城市向农村扩展，并到长辛店工人中去进行工作。

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

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上第一次纪念世界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在专号上发表了《五一节 MayDay 杂感》，指出这个日子是工人的“直接行动”(DirectAction)取得成功的日子。

同时，他着手帮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这时，已面临着“五四”群众运动高潮的前夕。

李大钊组织起来的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一部分爱国青年，这时经常在一起活动。

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越来越公开露骨，民族危机日益紧迫严重。由于军阀政府腐败无能，这一部分爱国青年已感到宣传教育、出版等等行动不能满足当前斗争的需要了，他们越来越经常地讨论着一个问题：“直接斗争！”

李大钊在向他们宣传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情况时多次提到“直接行动”，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不经当局同意批准，发动群众，直接采取法律范围以外的行动，达到革命目的的意思。“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和鼓舞着那些爱国青年志士们，他们正在跃跃欲试，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就是这样在酝酿着。而李大钊在“五四”前夕的文章中，第一次把“直接行动”公开地提了出来，这实际上是“五四”革命大风暴来临的一个信号。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上蛮横地决定承认日本掠夺去的在我国山东的权益。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四处奔走，组织北京学生，强烈抗议。

5月3日晚，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各高等学校的代表，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集会。会上作出决议：

1、次日北京的各学校学生到天安门前集合，举行爱国示威大游行。

2、联合社会各界一致力争。

3、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4、通电各省，于“五七”国耻纪念日，举行示威游行运动。

在会上，有一学生激昂地将自己的中指咬破，割下衣襟，用鲜红的血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全场为之震动，同学们慷慨陈词，声泪俱下。

1919年5月4日。

上午，14个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在法政学校开会，讨论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

会后，各校代表纷纷回校，去带领队伍陆续开往天安门广场集合。北京大学的学生队伍，由于受到军

警阻挠最后到达。

下午 1 时 3 0 分，浩大的示威游行开始了。

各校学生手持“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拒绝和约签字”等旗帜，高呼口号，昂首前行。他们散发了 1 万多份传单，其中号召：“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召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沿途还有许多市民参加到游行队伍里来。

大家首先向东交民巷行进。身为大会指挥之一的傅斯年，害怕游行队伍“越轨”，曾极力阻止向东单曹宅前进。但是，各派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积极分子，带领游行队伍，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在曹汝霖住的地方——赵家楼，愤怒的爱国群众，创造了“火烧赵家楼”这一页壮烈的历史。游行中，有 3 1 个学生和 1 个市民遭到被捕。但群众斗志毫不减弱，反而更加高涨。

就在 5 月 4 日那天，《每周评论》第 2 0 号出版了。它把帝国主义的巴黎和会与南北军阀的上海和会都称作分赃会，说“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仅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5 月 5 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同时罢课。

5 月 6 日，经过一天准备，成立了北京中等学校

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再接再厉，坚决要求出席“和会”的专使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坚持严惩卖国贼，积极地营救被捕的同学和市民。李大钊为营救学生，到各处奔走。

5月7日，在这一天勿忘国耻的沉痛的纪念日子里，京郊长辛店的工人们举行了大罢工。

5月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反动政府的逼迫下辞职出走。李大钊等北大教职员代表于10日向北洋政府交涉，坚决挽蔡。李大钊为留蔡向各方呼吁。

“五四”运动爆发后，《每周评论》以特大号字“山东问题”为标题，连续报道和分析运动的进展情况。

李大钊于5月18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文中号召人们“改造强盗世界，不让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指出：我们的敌人不仅是“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和曹、章、陆这些卖国贼，而是整个“强盗世界”。

5月19日，北京大、中学校总罢课，到处举行讲演活动，并组织10人团，成立护鲁义勇队。接着，又出版刊物《五七》，宣传爱国思想。还派了黄日葵等4人，到天津、上海、南京等地联系。

这时，爱国运动已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全国各大城市举行罢课、罢工和罢市。

“五四”运动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起了领导作用和骨干作用。毛泽东在湖南，恽代英在湖北，马骏、周恩来在天津，都是大家公认的运动领袖。李大钊在北京所起的领导作用，是毫无疑问的。

6月3日以后，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学生走入工人中去了，李大钊在“五四”前发出的“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的号召，这时产生了实际的效果。

6月11日，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到外城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宣告：政府若不“听从市民之希望”，劳工、学生、商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当被捕学生已获释，3个卖国贼已被罢免之际，《宣言》为人民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推动了运动的发展。陈独秀在“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时被捕，李大钊极力营救。

6月28日，是所谓“巴黎和约”签字的日子。北京、天津、山东各地的代表，以及留日、留欧学生代表，还有许多爱国群众，从27日起，就不分昼夜地在新华门总统府前示威，高呼口号：“一定要拒签和约！”“誓死保卫山东主权！”“我们不当亡国奴！”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要他保证不在“和约”上签字。在巴黎的我国工人和学生，也包围了出席“和会”专使的住所。李大钊接连写了许多短评，立即在29日

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他激昂地写道：“今天是和约签字的日子，巴黎的欢声必能送入全世界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常纪念着今年今日新华门的哭声”。“这样的炎天酷日，大家又跑到新华门前，一滴血一滴泪的哭。唉！可怜！这斑斑的血泪，只是空湿了新华门前的一片尘土”！

6月30日，北洋政府发表了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28日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的来电。在全国人民群众的巨大压力下，他们终于拒签了和约，运动取得初步胜利。

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为着革命斗争的需要，李大钊更加勤奋地钻研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一年时间里，他就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平均不到4天就写成一篇文章。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到思想道德问题；从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到妇女运动；从工人的生活、农民的疾苦、青年的教育问题到社会其他问题如士兵问题、面包问题、失业问题、自杀问题、废娼问题等等，其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写。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尤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长篇论文最为重要。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个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

在1919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101周年纪念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到11月11日为止，这个专栏开了6个多月，曾陆续刊载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和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文。

李大钊还准备将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六卷5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就在这上面，他着手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长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提到了自己搜集资料的过程：自191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日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于是，“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向《新青年》读者介绍。李大钊为写这篇文章做了大量的搜集和研究资料的准备工作。由于他早已认识到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勤奋不懈地研究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又始终投身革命斗争实践，指导群众运动，同时，在日本时就熟练地掌握了日文、英文等外语工具，所以能够在十月革命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达到对马克思主义比较系统的了解，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著名的文章。

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分别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经济论等，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于1919年9月至11月

在《新青年》六卷5号、6号上连载完毕。这篇文章写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候，中国革命正处于由旧民主主义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文章阐述得还不尽完备，有些地方写得还不够准确。但它毕竟是我国最早比较系统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当时在我国，马克思的原著还没有整本地翻译过来，李大钊根据河上肇的日译，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集中翻译了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部分，这对于此后在我国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也起了很好的影响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各地相继涌现了许多传播新思想的刊物。李大钊在北京收到各地寄给他的刊物，这些刊物都采用了与《每周评论》相仿的版式，说明《每周评论》在全国的影响之大。李大钊看后，认为长沙的《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为深刻的刊物。《湘江评论》的主编，就是几个月前和李大钊一起工作过的毛泽东。1919年3月间，毛泽东和李大钊分别后，经上海回到湖南，“五四”期间，直接领导了当地的革命运动，于7月间出版了《湘江评论》。

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遭到敌人的极端仇视。同时也受到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阻止。众所周知，李

大钊于1919年8月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作出了鲜明的反驳。对胡适鼓吹的一点一滴地改良、反对根本改造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驳得体无完肤。此后，他对各种反动思潮，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进行一一批判。他的文章如同他的为人一样，观点是鲜明的，态度是平和的，总是以正面阐明道理，很少用尖刻挖苦的词句，就是对别人的讽刺谩骂，他也是置之不理而已。这样以理服人，反而效果更大。

1919年8月底，北洋军阀政府查封了《每周评论》，同时还在邮电局扣留了和《每周评论》版式相仿的其他刊物。

1919年9月间，被北洋军阀政府关押了3个月的陈独秀，经李大钊等营救，终于被释放出来。李大钊为欢迎陈独秀出狱，写了一首诗，对陈独秀的感情表露得较充分：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
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

诗中所说“不见了”的报纸，就是被查封的《每周评论》。对被捕前的陈独秀，李大钊认为他是个民主主义者，而“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陈独秀受法兰西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太深，所以他对接受马列主义思想转变较慢。“五四”群众运动特别是“六三”运动中工人力量的表现，对陈独秀思想的转变是有作用的，但更重要的是3个月的铁窗生活，使他清楚地认识到，旧民主主义在中国行不通。陈独秀出狱后不但不消极，反而更积极了，他和李大钊一起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展开对各色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中，可以看到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李大钊影响了“五四”时期一代的知识分子，

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逐渐走上了马克思、列宁指引的道路。

面对军阀政府的加紧迫害，李大钊镇定自若，继续放手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正在这时，李大钊和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建立了亲密的联系。

“五四”运动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天津青年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越来越感到很有必要建立一个革命组织，于1919年9月16日成立了觉悟社。觉悟社的成员还有邓颖超、郭隆真、于方舟等。周恩来“为了中华之崛起”，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于1917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开始接触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回国后，又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读了李大钊的许多文章，迫切地期望从李大钊那里得到更多的教益。因此，在觉悟社成立会上，他提议，请北京大学李大钊先生到天津来作指导。由于李大钊当时在大家心目中已是新思潮的号角和黑暗中的向导，提议得到一致赞同。

1919年9月21日上午，李大钊应邀到天津作讲演。学生、青年们奔走相告：“李大钊先生来演讲了！”听讲的人很多，讲演厅的大门几乎被赶来听演讲的群众挤破了。他讲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斥责推

行强权的日本帝国主义，阐述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求得解放的途径。他的讲演，深深地启发和鼓舞了天津的青年学生和革命群众。

当天下午，李大钊又不辞辛劳地来到学联会议室，同觉悟社的青年们座谈。对他们准备出版刊物《觉悟》表示大力支持。并要他们认真研究各种新的思潮，特别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多了解苏俄，取得了真理，就要贯彻到行动中去。

1919年10月12日，国民杂志社举行成立一周年纪念会，李大钊到会发表演说，号召我国人民起来排斥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指出，“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实际上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12月7日，李大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当时口头上讲“中日亲善”，实际上进行野蛮的侵略，在当天的《新生活》上发表文章，作了尖锐的揭露。他说：日本人的吗啡针和中国人的肉皮亲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金钱亲善，日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的侵略主义和中国的土地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亲善，这就叫“中日亲善”！

接着，在12月12日的《国民》杂志上，李大钊紧密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发表了《再论亚细亚主义》一文，深刻地指出腐朽的帝国主义外强中干，人民群众一定有力量摧毁它。

1 2月1 2日，李大钊还参加了北京公立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会议，会议决定于1 5日各校全体停职，展开索薪斗争，并推举李大钊负责新闻方面的工作。

1 2月2 8日，李大钊发表《大联合》一文，指出：“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并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

毛泽东曾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 9 2 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他在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工作，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四章 建党前夕

随着“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日渐发展，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产生已经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1920年初，李大钊就曾和邓中夏等酝酿过组织共产党的问题。

1920年1月，陈独秀要避居上海，李大钊不避艰险地护送他离京。因陈独秀北方话说不好，沿途遇到军警检查，都是李大钊对付，一直把他送到天津上船。一路上，李大钊也与陈独秀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1920年5月以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备建党时，考虑到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拿不定注意。写信问李大钊。李大钊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叫共产党。

送走陈独秀，李大钊在天津，曾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到旧俄租界去会见一位苏俄朋友，交换革命意见。但是，他们的会见被敌探发觉，并张扬出去，第二天，一家报纸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便立即返回北京。

由于李大钊在中国最先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

宁主义，并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卓越领导作用，他在北京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这使他很自然地成为北京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带头人。许多青年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导师，跑来听他的教诲，请他帮助。而李大钊就在与青年的广泛接触中，开始了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

1920年3月，在几经酝酿、讨论后，他终于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不久，瞿秋白也参加了进来。

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学习条件非常困难，既有反动统治阶级的严禁和封锁，又有社会上顽固的守旧派的阻挠，使得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都难以找到，马列主义原著更难找到，他们必须艰苦地搜寻。开始，他们只能学到《新青年》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少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如1920年4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还有河上肇以及考茨基所写的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都被大家辗转相传，争相阅读。后来，经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了一批外文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组织通晓外文的会员帮助大家学习，这样才初步解决了学习材料方面的困难。

以后，在李大钊帮助下，大家逐渐搜集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又筹集到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有关的图书。

研究会成立后，几经交涉，得到蔡元培校长的支持，学校拨出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办公会址。在那里，他们设立了一个附属“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小型图书室，并亲切地称它为“亢慕义斋”（译音，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这个“亢慕义斋”图书馆，是我国第一个存有比较丰富的马列主义书籍的图书馆，有健全的借阅规则、制度。直至现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还保存着当时一些盖有“亢慕义斋”图章的书籍。

在李大钊领导下，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进行着紧张的活动。当时，邓中夏等每天一早就到北大三院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聚在一起讨论革命问题或交换学习心得，总要到深夜才散去。通过这些活动，他们加深了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并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强烈要求。这就为后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有了更多的联系。通过这些联系，他积极搜寻当时能找到的一切中文共产主义文献，还读

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后来，他曾回忆这个时期的情景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后来用这方法论更深入地思索了各种社会问题，从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起信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当时还曾跟李大钊商量过考虑组织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之事。

1920年，李大钊仍然在大量写文章。7月8日，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职务改为教授。担任了教授后，他又到处讲课，宣传马列主义。他这时着重宣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用它来解释中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1920年9月，他与进步教授陈启修在北大政治系举办了“现代政治”讲座，主要讲授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状况等。10月初，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这一重要课程。以后，又在史学系开了“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在经济系开了“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在法律系开了“社会主义”等多种课程。他的讲课，

都从不同角度传播了马列主义思想，受到了青年学生的普遍欢迎，特别是“唯物史观”等课，对青年有过重大的影响。其中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就是很著名的文章。他说：“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又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态度、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他一贯深信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坚决反对个人迷信。

如果说，十月革命前，李大钊所向往的“青春之历史”，还是一种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来的憧憬，那么到1920年，李大钊已清楚地看到，“青春之历史”，就是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自觉的斗争而创造出来的人民的新历史。这就鲜明地标志了李大钊革命思想的跃进。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发表的文章、讲义、演说，现在所知道的，就在130篇以上，他还在各校授课，所开课程也在10门以上。而这都是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不难看出，他为了宣传马列主义和传播革命思想，做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他对唯物史观的

宣传，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思想理论准备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组织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李大钊还于1920年夏秋之间帮助天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就是后来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前身，它从李大钊那里接受经常的指导，对天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起过重要的作用。

在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李大钊又领导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与工人群众相结合。

这种结合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虽然李大钊在1919年初就提出了“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的号召，但北京的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真正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决心到工人中去，还是在“五四”运动以后，而实际地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则是1920年以后的事情。

1919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学生发起北京5000多个大、中学生捐款买了17万个面包，印上“劳工神圣”等字样，分送给全市工人群众，同时，散发了30万张传单，并进行演讲。这次活动轰动了整个北京城，为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造成了良好气氛。

1919年底到1920年初，在北京的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进一步提出了要去组织工人阶级的问题。李大钊这时写了文章，号召“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核心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陈独秀也在《晨报》上发表了《告北京劳动界》的文章，提出要去组织北京各行业的工人。

经过李大钊等的宣传、号召，1920年1月，部分青年学生第一次分组到洋车工人的住宅区去调查工人们的生活情况。看到工人们贫困悲惨的生活，使他们受到很大震动，推动他们决心到工人中去进行革命工作。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洋车工人和北大的印刷工人中，开始了组织工会的活动。

在李大钊帮助下，邓中夏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一部分青年学生，开始到工人中去，接近劳动群众，把他们组织起来，实行“工读互助”。他们一面读书，一面从事一般性的体力劳动，改变旧知识分子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四体不勤的习惯和轻视劳动的思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大部分成员参加了这个组织，由最初的20多人发展到40人左右，坚持了一年之久。当时，曾经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并有一部分青年学生起而仿效。

他们的“工读互助”行动，也引起了那些“自命

为绅士的人”的仇视和反对。他们叫喊：“知识阶级的运动，不可学低级劳动者的行为。”李大钊尖锐地批驳了这种论调，他说：“这话很奇怪，我请问低级高级从哪里分别？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都比你们这些吃人血不做人事的绅士、贤人，政客们强得多。”继续鼓励知识分子坚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向。

1920年2月底，李大钊等在天安门召开了一次大会，用洋车把会场包围起来，学生发表演说。但是，大队警察冲过来把工人打了，洋车也打坏了，工人不干了。在组织印刷工会时，由于工头的阻挠，也没成功。所有这些，都说明开辟工作时的艰难。但李大钊和他的学生们并没气馁，他们逐步注意到当时在北京最主要的是铁路工人，又在铁路工人中开始了活动。

李大钊安排邓中夏及张国焘等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去进行工作。张国焘奉李大钊之命，和长辛店工人史文彬等建立了联系。

1920年4月8日，邓中夏带领平民教育讲演团一个组到长辛店进行讲演活动，并决定在那里找一个固定活动场所，经常去讲演。

平民教育讲演团初次在长辛店讲演，效果不佳。这主要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还没有放下架子，与工农还

没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和语言。一些本来就是以“救世主”的姿态下去的学生，这时候便责怪起群众“愚蠢”来，不肯到工农中去了。但是，以邓中夏为代表的革命学生，按照李大钊的嘱托，坚持下去，并通过虚心向工人学习，很快克服了起初的困难，学会了用通俗的语言同工人进行交谈，宣传革命道理。这样，逐步把长辛店开辟为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

1920年5月1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全国有近10个城市总计约6万工人群众举行了纪念活动，喊出了“五一万岁！”“劳工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打出了红旗。这是破天荒的创举。它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觉悟程度的提高，进一步鼓舞了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开展工作。

这一天，《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李大钊发表了阐述《五一运动史》的重要文章，许多有影响的刊物如上海的《星期评论》、《东方杂志》，南京的《少年世界》等都曾全文转载。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来历，以及多年来各国工人阶级在这一天为争取解放进行斗争的情况，歌颂了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而献身的英雄们。并着重指出：“五一运动”应当是真正“劳工阶级的运动”，而不是“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光是空喊

“劳工神圣”，而要实际地到“劳工”中去干发动群众的工作。

这一天，李大钊主持了北京大学的纪念活动。他所在的北大是这次北京五一纪念活动的中心。北大学生在这一天举行了罢课，《北京大学周刊》也出版了《劳动纪念号》。上午9时，校工和学生500多人在校内召开纪念大会，李大钊在会上讲了话。同时，何孟雄等学生租用2辆汽车，车前拉上横幅，上书“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等，车后插上红旗，从上午8点钟出发，分头去东、西城游行。沿途浩浩荡荡，格外引人注目，并高呼“劳工万岁”等口号，散发印有“五一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但最后全被警察拘捕。这次游行，曾被称为“初次的赤旗”。

这一天，平民教育讲演团50人分成5组，也于上午10时出发，沿街进行演讲“五一历史”、“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一劳动节”等。

这一天，邓中夏等还赶到长辛店去对铁路工人作了演讲，有1000多名工人参加，也散发了“五一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很受工人的欢迎。会后也举行了示威游行。

这一天，北大学生共散发了数千张“五一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第二天，许多报纸在纪念五一的消息报导中说：各地散发的宣传品，“以北京大学劳动

纪念会的印之‘五一北京劳工宣言’最为激烈”。比起以前在这方面所散发的宣传品，这个宣言的确是前进了一步，它没有重复“劳工神圣”一类含义空洞的词句，而是具体地提出了工人阶级将来的奋斗目标。它和李大钊在《五一运动史》中的根本思想是一致的，即劳动群众要积极行动起来，对骑在自己头上的压迫者、剥削者展开坚决斗争，争取自己的解放。

北京的这一次五一纪念活动，使反动军阀政府极为恐惧，他们在前门出动了3000多名军警，拘捕了一批讲演的学生，在北大附近驻扎了好几营军队，整队游行进行威吓。

五一节以后，北京有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李大钊领导下，不顾反动派的迫害和阻拦，投身到工人群众中去，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一面也改造着自己。这样就促成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在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方面，李大钊也给了天津的革命知识分子以积极的影响。

1920年8月初，天津觉悟社举行了一次年会。会上，周恩来总结了一年多来天津爱国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今后的救国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同时，把“五四”以后全国各地涌现的大小进步团体都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由于李大钊热情支持过觉悟社的活动，

会后，以周恩来为首的 11 个社员来到北京，将这个意图向他商量、请教，李大钊非常赞赏周恩来的想法。

8 月 16 日上午 9 时，觉悟社的 11 个成员，还有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的代表 20 余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了茶话会。周恩来、邓颖超首先发言，介绍了觉悟社一年多的活动情况，说明了召开这次座谈会的宗旨。各团体代表也都相继发了言。最后，李大钊讲话，他提出，各团体要有一个明确的主义，主义不明，就不能团结一致。并希望他们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

18 日，到会的五团体各派代表 3 人，又在李大钊指导下，在北大通信图书馆开了“筹备会”，决定五团体合组一个“改造联合”，讨论通过“改造联合”的宣言和约章，同时，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而且对于“到民间去”做什么事，也明确规定了“社会实况之调查”、“农工组织之运动”等。这些，在当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在李大钊的启发帮助下，不久，天津的革命知识分子也开始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活动。周恩来、郭隆真等去法国勤工俭学，于方舟等则投身到码头工人中去活动。

如果说，李大钊在 1919 年初号召“知识阶级

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还仅是初步提出了这一问题，那么，1920年以后，他的这些口号就已经建筑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础之上了。毛泽东曾指出：“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李大钊的见解，无疑是进一步给了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以正确的思想指导，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1920年9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较早参加这个小组的有邓中夏等，以后张太雷、何孟雄、高君宇、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等陆续参加了进来。除张太雷外，其余的都是北大学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小组成立前，就已在李大钊领导下学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活动。

由于当时还没有建立革命的机关，小组活动地点也就在李大钊家里和他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里。最初小组也还没有什么纲领和章程，要做什么，大家开会讨论商量，讨论好了就去办。尽管如此，有了这样一个当地的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各种活动的进行都是更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了。

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由邓中夏负责编辑。办刊的目的很明确，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

的团结，指导工人运动的进行。

《劳动音》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快就在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中广泛流传开来。出版后一个月，每期销售量已达2000多份。

李大钊领导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正是这样去身体力行的。在创办《劳动音》的同时，他们大力加强了在长辛店工人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在李大钊的积极倡导下，邓中夏、朱务善等几个小组成员，把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长辛店来。隔一星期就去演讲一次，每逢星期天，别的大学生逛市场、看戏，他们几个人却一清早就坐火车去长辛店，找工人谈心，交朋友，把这作为他们的假日旅行。

1920年冬天，李大钊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为了进一步深入地在工人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实习学校，作为工作的据点。经过与史文彬等工人磋商后，捐了些钱，租了房子，置备了桌凳，12月19日，在长辛店正式召开了“筹备会议”，12天后，即1921年元旦，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就正式开学了。

劳动学校从做工、劳动、为什么下雨打雷讲起，讲到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团结？为什么

要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资本家作斗争？再讲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政党、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苏俄，讲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等等。讲课内容由易到难，由浅入深，这些革命道理，犹如温暖的阳光，照亮了工人同志的心，马列主义开始在工人中生根发芽了。从劳动补习学校里，常常传出清晰有力的歌声：

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做牛马，思想起来好苦痛。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工人们的觉悟得到很大提高。就这样，培养起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又通过这些骨干，逐步将长辛店的全体工人团结了起来。这就奠定了成立工会和领导工人进一步开展斗争的基础。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的实践，创造了当时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

1921年5月1日，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隆重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还有市内别的工厂

和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也远道赶来参加大会。大会当场通过了成立工会的决议。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口号声、歌声以及沿路观众的欢腾叫嚷声，响成一片，“几乎把火车汽笛声都压住了”。恰似一曲雄壮的工人运动交响乐！

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领导工人建立起来的长辛店工会，是全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是京汉铁路工会运动由北而南发展的起点。当时的《共产党》月刊第6期曾热情地称赞它“不愧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这期间，李大钊还到郑州等地去视察和指导过工人运动。在郑州铁路工人夜校，他勉励工人们：“你们要好好学习文化，学技术。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他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紧接着写了个“人”字，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天”字。李大钊走后不久，郑州铁路工人就在夜校老师的帮助下组织了工人俱乐部。

1920年11月，李大钊和一些青年一起建立了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亲自入团，直接领导了它的活动。

李大钊还帮助张太雷、于方舟等在天津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并通过这个组织在天津、唐山等地的工人中开展了革命工作。

在做了以上大量工作的同时，李大钊又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北京在建立党、团组织的过程中，和全国各地一样，都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某些不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参加到党、团组织中来了，他们坚决反对党纲和团章中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定，为此，李大钊等人既在党、团组织内部，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内部，以至在全国报刊上公开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想。李大钊说得好，“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离开社会，亦无所谓个人”。无政府主义鼓吹的绝对自由、极端个人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如何孟雄等，后来也改变了他们的立场，成了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却始终坚持其反动立场，因而被清除出了组织。

当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开展具有全国性的规模而且两者已日渐结合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诞生条件就完全成熟了。

1921年6月，上海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各派代表2名，到上海举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30日，因法租界巡捕侵扰，31日便转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只游船上继续举行并闭会。出席会议的共有13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谭秋、邓恩铭、王尽美、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李克诺斯基也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组成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无比重大意义的一件大事。由于后来当事人记不清开会的准确日期，所以把7月份的第一天，作为党诞生纪念日。从此，7月1日便成为中共全体党员、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最光荣的节日。

李大钊和陈独秀当时都因公务繁忙没有参加“一大”。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都和李大钊有关系，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都和陈独秀有关系，“南陈北李”之称不是偶然的。所以李大钊和出席“一大”的毛泽东等都是我党的创始人。

中共“一大”之后，在北京成立党的北京地方委员会，到1924年，又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无论北京地委或北方区委，实际上都是在李大钊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北京、天津、唐山以及直隶、山东、山西、

河南、内蒙古乃至西北地区的某些党组织，都和李大钊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

党成立后，北京党组织在李大钊领导下逐步由北大发展到其他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大学、朝阳大学、美术专科学校等，都有了我们党的党员。1921年秋天，并在长辛店发展了史文彬、王俊、杨宝昆等我党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于1921年11月恢复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公开的活动，也迅速发展壮大。

李大钊领导北京党组织在创立初期所做的一系列建党工作，为进一步开展北方工人运动，迎接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第五章 “二七”风暴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北京成立了党的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李大钊代表党中央领导了北方的工作，中央的许多重要指示都通过他贯彻到北方，北方工作中的重大原则问题都请示他作决定。

党的“二大”以后，李大钊以党中央委员的身份，经常出席北京地委的会议，领导大家分析形势，确定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北方各铁路沿线、天津、唐山等地从事工人运动的同志以及从事党的其他工作的同志，也经常通过北京地委或与北京地委共同向他请示工作。

同时，鉴于他当时在社会上的巨大声望，党决定让他多进行一些公开的活动和号召。于是，他又到处演讲，发表文章，并在许多学校兼课，宣传党的主张和马列主义。

1921年8月，为推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我党成立了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大钊担任了这个组织的北方区分部的主任。北方区各地工人以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为榜样，发展工人组织，发动工人斗争，取得很大成绩。到1922年底，

已经建立起 16 个俱乐部。

当时，除长辛店、唐山等地外，我们党在北方工人中的工作还在开创时期。李大钊和北京的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工人运动的高涨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准备。

1921年7月间，北京党组织在李大钊领导下创办了我国早期的重要工人刊物——《工人周刊》。周刊着重报道各地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生活以及工人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情况，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极力动员组织工会，并大量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成了北方最受欢迎的一个刊物。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北方劳动界的言论机关”。创刊不久，销量骤增，一般的报纸当时常只销1000份左右，而《工人周刊》最多销到2000份。

1922年5月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由上海迁至北京，北京的《工人周刊》就成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的机关报。这个在李大钊领导下创办的刊物，对全国工人运动、特别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曾经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还充分利用长辛店这个成功的实例来影响和教育北方各地的工人。他让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帮助长辛店工人进一步完备了工会的组织，后又将工会改为工人俱乐部，直接领导工人进行了反

工头、反账房司事等狗腿子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样，使工人们扬眉吐气，感到自己的力量了，工头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同时利用《工人周刊》向北方工人宣传长辛店，使北方工人特别是各铁路的工人都知道长辛店有个俱乐部，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去参观长辛店，而这就又给了年青的党组织以更好的工作机会，乘势宣传，物色骨干，建立联系。各地代表回去后也纷纷组织起工人俱乐部。李大钊这时通过北京党组织派了许多干部到各铁路局去帮助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也有从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委员和骨干中派去的，并和这些干部保持密切联系。

在当时，从事工人运动根本就被军阀政府认为是非法的，而且大多数同志还缺乏工人运动的经验，到各地工人中去开展工作是有困难和危险的。李大钊热情鼓舞大家用大无畏的精神去进行艰苦的工作。他常对同志们说：“列宁在流放中还在组织工人，发动群众，俄国共产党人终于在列宁领导下战胜了沙皇，真不是偶然的事。我们的革命如果不深入群众，不经过长期的、惨烈的斗争，我们的革命前途很难想象。”

1922年1月，黄爱、庞人铨在领导湖南第一纱厂的罢工中牺牲。李大钊通过这件事对同志们进行教育，特地为当时出版的《黄庞流血记》一书写了序，指出：黄庞的死，是死得有意义的。他们不是为了自

私的目的而死，“ 乃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资本阶级的压制而死， 为他们信仰的主义而死”。他们“ 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 先驱遇险， 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 仍然要奋勇上前， 继续牺牲者愿作而未成的事业”！

为了配合工人运动的开展，李大钊还在理论上进行大力宣传。他在这个时期写了很多与劳动运动有关的文章，宣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通俗简要地阐明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秘密，指出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戳穿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谎言，并介绍了各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情况。

1922年“五一”节，李大钊在北京学生和工人代表参加的纪念会上作了演讲，又发表了文章，号召工人们“站起来”，“团结精进奋战”！并针对当时一些小资产阶级人士把“五一”节当成一种时髦来庆祝，指出：“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资本家的厄日”，中国劳动者应该用斗争来纪念“五一”节，而不应该去作那种为资产阶级“点缀升平”的庆祝。并提出“反对国际的军阀财阀的压迫”，“改善工人境遇”，“八小时工作”等作为工人阶级当前的斗争口号。

李大钊不仅从宣传方面积极推动工人运动，而且还作了许多具体的组织工作。当时，很多人常去找他谈有关工人运动的事，北方的同志不仅把他看作是党

的领导人，而且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有了问题就来同他商量，向他请教。1922年，他辞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的职务，改任校长室秘书，就是在校长办公室，许多同志也常去找他，至于平时或晚上在家里，去找他的人就更多了。他家的大门，不像当时北京不少人家总是关闭着、要敲门打户通报姓名后才能进去，而总是虚掩着，工人同志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

李大钊还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争取一些对工人阶级斗争有利的条件，推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22年4月底5月初，爆发了直奉战争。奉系军阀罪恶昭著，丧尽人心，直系军阀吴佩孚，由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打败了奉系张作霖，占领了京津一带，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为进一步击败对手，吴佩孚曾揭露张的劣迹，极力粉饰自己的门面，收买人心，拉拢工人，说工人支援战争有功，居然博得了“爱国将军”的招牌，因而一举打败段祺瑞。李大钊分析了前后种种情况，利用军阀间的矛盾，通过他的当时在吴佩孚幕下任政务科长的老同学白坚武，曾经亲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使他通电发表了“保护劳工”等所谓“四大政治主张”。吴佩孚这样做当然是假仁假义，他唱的所谓“保护劳工”之类的高调，全

是骗人的鬼话，只是暂时对工人采取的笼络政策。但是，我方争取他发表这样一个通电，在当时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还是有利的，李大钊充分利用了这个通电，领导各地工人，去争取一些可能争取到的合法权利，“乘此努力成就本阶级的组织，准备并训练本阶级的战斗力”。

吴佩孚占领北京，亲日派的交通系内阁也随之倒台。但是，交通系曾长期把持中国的铁路航运事业，他们的爪牙在铁路上星罗棋布，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李大钊又充分利用了吴佩孚和交通系的矛盾，他经过与吴佩孚幕下一些人物的私交关系，建议当时的直系交通总长高恩洪在每条铁路上派一个密查员，高竟然应允。于是，我党派了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等同志去担任北方6条铁路的密查员，这样，京汉、京奉、京绥、正太、津浦等铁路都有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密查员，极大地便利了这6条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尤其是京汉路沿线，工运发展迅速，到1922年底，已经在沿线建立起16个工人俱乐部。

李大钊自始至终直接领导了这几个同志的工作。去交通部前，李大钊亲自找他们谈话，部署工作，解决思想问题。当时，有的同志对于到反动派的衙门里去工作感到为难，李大钊指出：要从革命的利益着想。我们有了这个职务，可以掩护我们的秘密活动。同时，

要注意搞好同周围人的关系，最要紧的是不要暴露我们自己的政治身份。此后，李大钊经常找他们了解工作情况，并在工作上给予帮助和指示。

由于李大钊的积极领导和许多同志的艰苦努力，北方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工人，在党建立后的一年间普遍地组织起来，为北方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2年7月，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之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批判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各种改良主义思想，正式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国人民面前首先提出了“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真正彻底的民主革命的口号。

在这次大会上，李大钊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会后，李大钊在北方对党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展开了积极的宣传，领导了北方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李大钊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很多文章和演说，较系统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当时对中国的种种侵略活动，特别揭露了美帝国主义所倡导的什么“开放门户”、什么“四国银行团”，都不过是“新国际共管”的代名词，都不过是帝国主义共同压榨中国的新花样、鬼把戏！指出：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

体人民，都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组成一个民主的联合的阵线，去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

李大钊还有力地进行了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宣传。他认为，从现代革命运动来看，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而要实现真正的“平民政治”，就必须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首先必须打倒封建军阀的统治，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

为了贯彻党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主张，李大钊又着重批判了当时还在流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当时，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标榜“不过问政治”，对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采取了否定态度，仅用“振兴实业”、“举办教育”等方法来“改革社会”和“改造中国”，而不去反帝反军阀，不去解决政治问题。李大钊批判了这种看法，强调指出：欲改良社会，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非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团体不可，有了强有力的政治团体，才能进行革命，掌握到政权，先得了政权，才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1922年双十节，李大钊指示北京党组织利用当时庆祝“国庆”的机会，组织了以反对封建军阀为主要内容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长辛店、北京机器工业研究会的工人约2000人和各校学生及北京市民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是在北京街头有工人队伍参加

游行的开始。在游行时，散发了中共北京地委的《敬告国人书》和《敬告劳动者书》，文告特别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来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去实行暴力革命”。“同胞们！不要忘了我们伟大的群众革命的力量啊！”“快快运用我们伟大的革命呵！”

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北京党组织在开展各种宣传活动的同时，高举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大旗，猛烈地发起了工人运动，初次领导了农民的斗争，并使在军阀统治下沉寂了一年多的学生运动，也重新高涨起来。

首先，工人的罢工运动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

1922年10月间，罢工运动形成燎原之势，达到了这次北方罢工潮的顶峰。

在此以前，8月间的长辛店工人大罢工，是罢工潮的起点。9月是粤汉路长武段罢工，京奉路山海关罢工和安源煤矿的罢工。10月31日，唐山铁路工人罢工，23日，爆发了闻名全国的开滦五矿30000余工人的大罢工，28日，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大工厂20000余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前一天，即27日，又有京绥路车务工人的罢工，一直到12月15日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的罢工，罢工的潮流像一场猛烈的风暴，席卷了北方的铁路和矿山。

当时铁路工人的罢工都是针对军阀和军阀政府的，而开滦大罢工则是直接把锋芒指向帝国主义的。罢工除提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等经济要求外，多数又都提出了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开除工人须经工会同意等政治要求。这些表明北方工人运动在迅速地由经济斗争向反帝反军阀、争取民主权利的政治斗争发展。这个发展的集中表现，就是轰轰烈烈的京汉铁路政治大罢工。

这次罢工潮中，尤其是在全国具有深远政治影响的异常壮烈的开滦五矿大罢工。这次罢工共有30000多人参加，坚持了20天之久，虽然有英国军队、曹锟的军队和保安队数千人进行镇压，但工人们宁死不屈，宣称：“除非把我们全体工人都打死，不然，还留我们一人活着，也要为死者报仇，和他们决战！”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很大，对工人的教育很深刻，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壮举传遍全国，使敌人在全国人民面前又一次暴露了它狰狞丑恶的面目，给北方以至全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上了反帝反军阀的一课。

李大钊亲自参与了这次开滦五矿大罢工领导。他为发动罢工、扩大罢工、支援罢工和处理罢工的善后工作，费尽了心血。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学生成立了“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向各方面发

起募捐援助罢工工人，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召集全国各铁路工会的代表到北京，商议以全国铁路总罢工作声援，此外，李大钊还联络了一部分当时的国会议员，联名向军阀政府提出质问，扩大了罢工的社会影响。

在工人运动浪潮的巨大影响下，农民也开始起来进行斗争了。

李大钊亲自领导了一次北京郊区农民向封建军阀的斗争。这是我党领导下在北方最早的一次农民斗争。

北京近郊的农民大多以种菜为生，蔬菜卖到城里。军阀向菜农征收菜捐，不纳捐者不准上市卖菜。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在听到长辛店工人罢工取得胜利的消息后，就派代表找到长辛店工会，请求带领他们进行反抗。工会研究认为可以发动农民用停止运菜进城的办法来向军阀作斗争，并由铁路工人支援，通知北京附近各小站的铁路工会不让火车运菜进城。这件事情向李大钊报告后，他非常重视，热烈支持，认为这个主意出得好，并指出：“这样，工人农民就联合起来了。”他又提出了一个斗争方法：“还可以让农民停止进城掏粪。北京这个城市，如3天不掏粪，那些大人老爷就过不下去了。”

农民斗争很快就根据李大钊的正确指示发动起来了。农民也按照工人罢工斗争的办法，先给军阀政府一个“最后通牒”，紧跟着就停止了送菜和运粪。

军阀本来不把农民放在眼里，认为农民是庄稼汉，好欺侮。没想到在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庄稼汉竟有如此手段。很快全城就断了菜，街上臭气熏天，使得军阀一时束手无策。没奈何，只得接受条件，宣布停止征收菜捐。

这一斗争的胜利，树立了党和工人阶级在北京郊区农民中的威信，加强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联系，扩大了反帝反军阀斗争的战线。

继工农运动之后，学生运动也重新高涨起来。

1922年11月间，军阀政府任命臭名昭著的无耻政客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引起北京各校学生和教职员的强烈不满，于是发起了“驱彭斗争”。党通过北大学生会有组织地领导了这一次斗争。

1923年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不满彭允彝安置私党，克扣教育经费等卑劣行径及受军阀政府压迫，愤而辞职。北大全体教职员立即开会决定，由20人组成教职员临时委员会，主持校务，领导大家向反动政府作斗争，李大钊就是临时委员会成员之一，并在这个委员会中起了重要作用。从当时的会议记录中可看出，他曾多次发言，提出了全面的对策，并得到大家的赞同。

从“驱彭斗争”开始的学生运动，在发展中又增进了反帝国主义的内容。1923年1月19日，北

京学生1000余人向军阀的“众议院”请愿，要求收回旅大，遭军警毒打，伤者竟达300余人，其中重伤50余人。学校临时委员会推举李大钊起草通电，谴责军阀政府的暴行，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这场斗争在李大钊的领导下，进一步发展成了以“打倒军阀”、“推翻(军阀)政府”、“否认(军阀)国会”为中心口号的广泛的政治宣传。

在建党以后，李大钊继续领导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

为进一步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党决定将“学会”的组织公开。1921年11月17日，“学会”在《北大日刊》登载启事，公开招收会员。当时，已有会员19人，大部分是共产党员，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范鸿、黄日葵、朱务善等都在其中。“学会”组织一公开，会员人数增加很快，到1922年初，已发展到63人。以后，逐渐由北大发展到校外，北京各大专学校都成立了这样的组织，又由北京发展到外地，在1922年12月13日的征求会员启事中，把学生分为京内京外两类。

“学会”的活动大都是在李大钊直接帮助下进行的，活动方式有演讲会、专题研究、辩论会等。第一次公开演讲于1922年2月19日由李大钊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专题研究在李大钊指导下，研究

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俄国革命及其建设”、“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等问题。战斗性最强的活动是辩论会，其中一次举行了题目为“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的辩论会，李大钊被邀作“评判员”，这次辩论会进行了两天，北京各大专学校的许多师生都参加了，会场座无虚席，双方辩论异常激烈。最后，李大钊发表意见，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想听一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意见。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证明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正像封建社会因生产力的发展必定要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正像雏鸡在孵化成熟后必定要破卵而出一样，同为必然之理。并指出：“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来解答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驳倒反对派了。”他把道理说得透彻明白，使人心悦诚服。一个在会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必然到来，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了。”那次辩论会之后，要求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时即达数十人之多。

此后，李大钊还发表了《社会主义释疑》、《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等演说和论文，进一步阐释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真理。反复地说明：社会主义的到来，乃是“非人们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客观规律，乃是“历史的命令”，自从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把她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定了。”

1922年5月5日，研究会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大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并写了《马克思与第一国际》，登在次日出版的《晨报》副刊“马克思纪念专号”上。

1922年11月，“十月革命”5周年，在李大钊的发起和推动下，《晨报》副刊出版了“俄国革命纪念专号”，这是在中国报刊上为纪念这个伟大节日第一次出版专号。李大钊在这个专号上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的著名论文，着重指出：“十月革命所喊出来的口号是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用这一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

11月7日这一天下午，李大钊领导北京各进步团体在北大三院举行了“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3000多人参加了大会。李大钊被公推为大会主席。在会上作了《苏俄革命的历史及对世界的影响》的重要演说，全面介绍了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经过情形，赞扬与歌颂了革命暴力，表现了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精神，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一切反动派、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在极力攻击十月革

命的所谓“不人道”、“残暴”和“恐怖”，李大钊的演说，给了那些反对者、伪善者、认识不清者以当头一击。

这一时期，李大钊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根本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第一要夺取政权，而政权的夺取，“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以无产阶级的权力代替中产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批驳了那种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诬蔑无产阶级专政“不民主”的谬论，指出：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议会仅是替资产阶级“装潢门面”的“饶舌的机关”，“纯是欺人的方法，”列宁领导下的“劳农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正的“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的开端。真正的民主政治——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

正当建党伊始，我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第一个高潮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李大钊抓住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问题”，着重进行了多次公开的介绍和宣传，毫不含糊地维护了马克思列宁的革命学说，表明了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并为当时的工人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斗

争方向。

1923年爆发的“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不但震惊了全中国，而且震动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用他们的头颅和热血，唤醒了中国人民。悲壮的历史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先锋，才能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中国工人阶级的威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确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与工人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同生死、共患难，真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正由于从工人运动中锻炼出一大批优秀的干部，中国共产党以后才能正确地领导全国人民的斗争，才能用工人阶级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去领导农民运动、农民战争，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战争不可避免的悲惨命运，而把革命引导到最后的胜利。

“二七”大罢工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如前所述，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已经建立了16个分工会，并已遍及全路，这些为大罢工作了组织上的准备。而党在工人中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教育和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宣传，以及对吴佩孚的罪行的揭露等，则为大罢工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李大钊也为这次大罢工作了重要的准备。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在郑州召开，军阀吴佩孚竟用武力横加禁止，野蛮地迫害工人代表。

2月4日，京汉铁路全路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进行反抗。

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授意和庇护下，下令对汉口、长辛店等地罢工工人实行血腥的屠杀。工人死难者40余人，伤数百余人，被捕入狱者60余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100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同志、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同志壮烈殉难，造成震动全国的“二七惨案”。

工人们不畏强暴，同敌人进行了断头沥血、惊心动魄的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临危不惧、至死不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轰轰烈烈的“二七”大罢工虽然遭到失败，但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最坚决、彻底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威力，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为后来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李大钊是这次大罢工的积极领导者之一。2月1日以后，京汉铁路总工会迁往汉口江岸办公，汉口就成了罢工的指挥中心，而李大钊这期间正在汉口，同罢工的领导人陈谭秋、施洋等同志都有过接触，商谈

罢工之事。他对这次罢工极为关切，对于阶级兄弟的牺牲，他比失去自己的亲人还悲痛，一年后回想起来，还觉得“实在难过”。“二七惨案”中，他多年的同学、从小的朋友白坚武，为吴佩孚出谋划策、残害工人，李大钊立刻写信痛斥这个吴佩孚的帮凶，并宣布跟他断绝一切关系。“二七惨案”后，大批的工人死伤、入狱，大批的工人被开除，流落街头。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全国50多个工会被封闭，工会领袖被通缉，新兴的中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在那艰苦困难的的环境下，针对某些人的悲观失望、志气消沉，李大钊写了《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有力地宣传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对革命前途仍然充满信心。他说：“革命的道路，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一流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宽阔的境界，一泻千里，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曲折回环，”“民族生命的进展，其经历亦复如是。”“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我们要像扬子江、黄河一样，“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对“二七惨案”的善后工作，李大钊也尽了最大努力。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发表了许多宣传唯物

史观、社会主义的演说，并在党所主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上海大学多次演讲。1923年5月4日，他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演说中，号召学生继续“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1923年“五一”、“五七”，他领导北京党组织发动北京各群众团体两次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继续向军阀斗争，仅“五一”即“散发传单数万张”。国民大会通过了“拥护农工之集会结社罢工的绝对自由”，“释放京汉罢工被捕者”、“恢复各铁路及各业工会”等项决议。1923年九、十月间，他又领导了反对直系军阀头子曹锟贿赂选总统的运动。

李大钊在“二七惨案”后所做的许多工作，推动了北京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第六章 联合战线

1922年到1924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李大钊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促成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直至1925年在内蒙古地区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在这一时期，李大钊为了党和革命的事业，不辞劳苦，奔走在大江南北，万里跋涉，往来频繁，为促成国共合作，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工作，在1922年8月至1923年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四跨长江，三赴上海，两下广州。

“二七惨案”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要求更加迫切了。早在我党创立之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根据他在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活动的经验，主张东方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的工人政党，应该也像印尼工人加入“泛伊斯兰同盟”那样，结成民族阵线，所以他主张中共应与国民党联合。为此，他于1921年八九月间，由张太雷陪同并作翻译，专门赴桂林与孙中山会谈，取得了一些效果。1922年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提出了要建立广泛的民主主义联合战线。7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李大钊没有去参加党的“二大”，但被选为中央委员。李大钊也没有参加7月1日在杭州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但他与邓中夏、黄日葵等6人联名向大会提出了一个《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的提案，希望“有诚意改革社会的人们”，“起来引导民众，打倒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并说：“任何主义者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中国的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始终不为军阀的威力所屈服。……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在这次年会上，经过激烈的斗争，通过了一个进步的决议：“本会对时局的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为实现此种目的，本会用舆论及其他方法为独立的活动。同时，国内外任何团体，凡实际上能作此种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者，本会必要时得予以相当的协力。”

1922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集中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和张太雷等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李大钊坚决支持共产国际的指示，主

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要实现联合战线，加入到国民党中去才是行得通的办法。经过反复讨论，通过了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同时要求国民党实行改组，取消入党时要打手印、要宣誓服从领袖等封建会党的做法，改行民主主义的原则。

会后，根据党的决定，李大钊去见孙中山。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和孙中山有过接触。这时，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从广东来到上海避居，李大钊即于8月下旬会见了孙中山，同他进行了多次的交谈。他们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当李大钊说明自己是中共党员，而中共党员也就是第三国际党员时，孙中山表示：你们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李大钊根据党的指示，同意了这个提议，会谈结果十分圆满。于是，李大钊等人随即由张继介绍，由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迅速转变。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研究改组国民党的计划，起草宣言和党纲党章诸问题。在1923年元旦发表了一个《中国国民党宣言》，这是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展的一个飞跃，这是和共产党人对他的帮助与影响分不开的。从此，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积极进行起来了。

1923年1月，苏俄政府派来中国的特使越飞，从北京来到上海，经过李大钊、林伯渠的联络介绍，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与越飞相见之下，“极为喜悦”，当即开始了会谈，李大钊、林伯渠也参加，一连整整谈了6天，进一步商讨了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与建军，以及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于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震惊了国内外。经过频繁的接触和会谈，李大钊与孙中山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成为孙中山全家特别欢迎的客人。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他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这些人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思想和无畏的勇气。“孙越宣言”的发表，消除了国民党方面一些人对联俄、联共的顾虑，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发展。

此后，李大钊继续本着又联合又批评的精神，对国民党和孙中山进行帮助。他在《向导》上发表文章指出：“作为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但是，过去国民党“不大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而出找寻那些呼唤的声音去宣传去组织，”组织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学生，组织商人，“发展普遍的国民的运动。”

1923年6月，李大钊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西湖会议虽然作出了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决定，但仍有不少的党员思想不通，所以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仍然是讨论如何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合作，实现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和李大钊都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一面要参加到国民党中去组成和壮大革命统一战线，一面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由于他们坚持了正确的主张，两人都被选为三届中央委员。张国焘始终坚持其宗派主义的错误主张，因此他虽然是一、二届的中央委员，这次却落选了。这次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这种民主主义的立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郑重地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但仍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具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这样就更加明确了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三大”期间，孙中山又特地邀请李大钊与他在广州会面。他们商讨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外交政策问题。

为了贯彻党的“三大”决定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李大钊在党内做了许多工作。

1923年秋，鲍罗廷由苏联政府派来中国，应

孙中山之聘为政治顾问。他也是先到北京与李大钊联系。李大钊就此约集北京地委的负责同志和他一起讨论国共合作事宜。李大钊指出：“今天革命事业的客观形势，是需要发动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任务不是现在那样的国民党所能担当得了的，必须要加入新的血液，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而共产党为了进行这个革命，也需要同国民党合作。“因此，建立两党的联合战线就成了必要和适时的了。但是，国民党的缺点很多，无组织无纪律无群众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还是大有可为的。如果不这样，仅就国民党的现状来谈国共合作，那就不成。”总之，“只要国民党有改造的可能，孙中山有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就是可能的，我们就应该积极地去促其实现。”

“孙越宣言”发表和我党“三大”召开后，国共合作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进行顺利。11月，国民党正式发表了改组宣言。接着又采取了重大的组织措施，宣布要在全中国重新登记党员，成立临时中央委员会，指定专人积极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召开，孙中山指定李大钊为北京的代表。李大钊自参加我党的“三大”回到北京后，积极贯彻

党的决议，一面说服党员，统一党内思想，一面打出国民党的旗帜，建立起国民党的组织，吸收许多青年加入国民党，但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李大钊于1923年底去广州经上海时，中共中央委派他组成一个指导小组，指导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李大钊到广州后，孙中山立即让他和廖仲凯参加了改组国民党的重要工作。大会期间，李大钊是主席团的五个成员之一，和孙中山一起主持了整个会议的进行。同时，还担任了大会的许多重要职务，会上所设立的全部四个委员会中，他就担任了三个委员会的委员，是大会兼职最多的一个。尤其是大会上通过的宣言和党章，经过李大钊等共产党的努力，表现出国民党的巨大进步。但在讨论党章时，几个国民党右派分子却跳了出来，反对党内有党，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提出要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规定。进行破坏捣乱，还污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因此，李大钊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我们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李大钊的声

明，义正词严，合情合理，批驳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反动论调，清除了一部分人的疑虑。大会通过了实行三大政策的宣言和党章，选举了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为正式委员，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为候补委员，参加国民党的中委执行委员会。这样，终于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成了革命统一战线。

有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又有了广大革命根据地作依托，随后又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建立了革命的军队，所以中国的革命运动，在全世界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之后，还能从1924年起逐渐上涨，到1925年至1927年形成为巨大的革命高潮。

1924年2月底，李大钊从广东回到北京后，立即用国民党的旗帜展开工作。不多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成立了，天津市和直隶省的国民党部也成立起来了。接着，各地各级的国民党部相继成立。后来还成立了国民党的北方执行部以及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在北方，几乎所有的国民党组织都是共产党人着手成立起来并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

由于群众运动的高涨和国民党势力的发展，李大钊的名声越来越大。当时的北洋军阀愚昧无知，他们害怕“赤化”，因为国共合作，他们也不分什么国民党、共产党，笼而统之，把孙中山称作“南赤”，把

李大钊称作“北赤”，都是他们心目中最痛恨的对象。

1924年5月下半月，由于张国焘的叛变出卖，李大钊、张昆弟、高君宇等许多共产党员被北洋军阀政府明令通缉，李大钊被迫避居到故乡附近昌黎的五峰山。反动军警不但搜查了他在北京的住址，而且曾经到他乐亭的故居去抓人，但他们两次扑空。李大钊的夫人很为他担忧，请人捎信到五峰山，想托白坚武做个人情，取消通缉令。李大钊坚决拒绝，他在给夫人的回信中说：去托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时，我们虽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就断绝了交往。他在直系军阀幕下摇羽毛扇，而我却站在革命的一边。就是亲兄胞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何况我与白坚武？“那张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缉令，没有什么可怕，”“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倒我的。”“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时间来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焦急，而要振作起精神来，抚养和教育子女。”“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李大钊平时是那樣的忠厚，那樣的和藹，但一到緊要關頭，他的革命信仰就是那樣的堅定，他的鬥爭意志就是那樣的頑強！怎不令人肅然起敬呢！

1924年6月上旬，李大钊接到党中央通知，委派他为首席代表，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上就中国民族革命问题发表了声明，同托洛茨基集团的反列宁主义路线作了斗争。会后他留下来，担任了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在苏联呆了近5个月，其间参观了许多地方和单位，得以亲眼看到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又亲眼看到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支持，更加增强了他对共产主义和对中国革命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心。这年初冬，李大钊不顾敌人继续在通缉的危险，秘密地回到北京，立即投入正在高涨的革命斗争中。

李大钊对革命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首先集中于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党派问题和社会团体问题，但他同时对团结各兄弟民族来共同参加中国革命也非常重视。还在1923年，李大钊就亲自领导邓中夏等一些同志，开始在北京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去进行工作，于1923年至1924年，发展了乌兰夫等一批中国共产党蒙族党员，在这个学校建立了党的组织，一批先进的蒙古族青年觉醒并组织起来了。从此，蒙藏学校就成为我党在少数民族中从事革命活动

的重要据点。

李大钊、赵世炎等都非常关心和重视这个学校的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还时常来参加学校党组织的会议，为大家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理，分析国内外形势，使大家逐渐认清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和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斗争的关系，认清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获得。在李大钊等深入细致的帮助下，一些蒙族青年在政治思想上迅速成熟起来，蒙族学校的党团员也发展到数十人之多。在以后北京的历次革命斗争中，蒙族学校的进步学生都常常站在斗争的前列。

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还对1921年因逃避反动王公迫害而来到北京的锡尼喇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锡尼喇嘛留居北京达4年，党通过内蒙古进步青年和同他有关系的汉族共产党员，向他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理和十月革命后的种种情况，使他的觉悟大为提高，逐步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此后由于锡尼喇嘛的积极活动，在他的周围又团结了一批进步分子，扩大了内蒙古革命活动的阵线。

为了团结更广泛的阶层和更多的人士参加革命，李大钊根据国共合作经验，主张在内蒙古地区也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1924年4月，首先在蒙藏学校

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它比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更要广泛得多。随后，由李大钊向我党中央建议，经共产国际同意，决定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10月27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内蒙古东西部各盟镇的代表100余名，另有青年学生代表50余人参加。共产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国民党代表和冯玉祥国民军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同时，共产党人吉雅泰、李裕智等和锡尼喇嘛等进步分子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还决定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开办内蒙古军官学校，选派蒙族青年到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去学习。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因而它的成分比较复杂，但它的骨干大部分为中共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它的基本成员是劳动农牧民群众。虽然它的上层分子白云梯等人后来背叛了革命，但我党的领导和影响是主要的，它在内蒙古地区传播革命思想，发动革命斗争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党根据内蒙古地区民族组成的特点，为更好地团结蒙、汉各族劳动人民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决定成立工农兵大同盟。李大钊于1925年冬亲赴张家口领导了这项工作。他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在一起，了解情况，进行细致的组织工作。

李大钊亲自主持了工农兵大同盟的成立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蒙、汉各族工人、农民、牧民、士兵的代表共有200余人，大会选举李大钊和赵世炎担任大同盟的正副书记。这个大同盟是党在内蒙古地区成立的第一个群众性组织，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内蒙古开展工作的主要阵地。

第七章 “五卅”前后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加速了革命的步伐，1924年以后，北方的革命运动和全国一样，又重新高涨起来。

1924年底，根据党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由李大钊负总责。他和赵世炎、陈乔平、范鸿 等一起，领导了整个北方——东到东三省，西到陕西北部，南到直隶、山西，北到内蒙的广大地区的革命斗争。亲自领导了北方的“召开国民会议”、“五卅”、“关税自主”、“三·一八”等多次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脏，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北方区党委成立初期，李大钊的工作主要是为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准备。

李大钊着手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亲自召集会议，研究如何发展党员，在各处建立党组织。亲自组织秘密印刷所，在北方翻印了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并对《政治生活》周刊加强了编辑、出版、发行工作，成为北方区党委的机关刊物。这个刊物当

时曾发行到数千份，在北方的工人、学生及其他进步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李大钊除亲自指导其编辑出版外，还用“猎夫”等笔名在刊物上发表很多文章。

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在党中央领导下，采取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的正确策略。李大钊亲自对冯玉祥做了许多工作，又派其他同志对冯玉祥部下主要将领做了许多工作，向他们解释和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此外，还派了一些同志直接深入到国民军中去，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进行宣传活动。这些工作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国民军驻扎的直隶、河南及察、绥地区，我党在群众中开展活动时，他们基本上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中立态度。在北京，有时还争取了国民军的大刀队以“维持秩序”为名，实际上保护群众的集会、游行，来对付段祺瑞军警的破坏和攻击。

李大钊还领导北方各地的党组织，充分运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形式，来公开组织工、农、学生运动，团结最大多数的群众，扩大了革命的势力。

李大钊这时还作了很大努力，来恢复“二七”以后暂时处于低潮的工人运动。

北方区党委成立后，全国铁路总工会划归区党委

领导。区党委和李大钊领导“铁总”，通过与国民党的关系，救出了“二七”以来被捕的工人领袖，恢复了“二七”以来各铁路失业工人的工作，在很短时间内，铁路工人运动就又重新发展起来。京、津、正太、陇海、胶济、京奉、京绥各路工会基本恢复到“二七”前的局面，京汉铁路总工会得以恢复。并于1925年2月7日，在郑州召开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开幕这天，李大钊在“铁总”出版的《“二七”二周年纪念册》上发表了《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一文，总结了“二七”斗争的经验，向工人群众发出了继续战斗的革命号召，用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势不两立的态度教育工人群众。文章指出：“现在，吴佩孚的势力虽然烟消火灭了，但那些凶残的帝国主义者仍旧在制造军阀来摧残我们的民众，因此，绝不能因恢复工会等一时的胜利而对反动统治阶级存在幻想，放松对敌人的斗争。工人阶级和那些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们，更要奋勇万倍地高扬那鲜红的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路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进攻！”大会决议：现在风起云涌的国民革命运动，其第一个目的就是打倒帝国资本主义，中国工人阶级绝不害怕军阀之横暴，更不害怕洋人帝国主义者的威风，工人阶级应当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以达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目的。

除铁路工人运动外，李大钊还领导北京的党组织，利用北京政变后的时机，使北京的工人运动也有了飞跃的发展。1925年1月，有电车工人的罢工，3月，有影响很大、使20多家报纸不能出版的1800余印刷工人的罢工，又有织布工人罢工，398家菜园工人罢工，造纸厂工人罢工，铁铺工人罢工。4月，6000余瓦作工人罢工，还有北京附近的宣化皮行5000余工人罢工……罢工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北京大多数行业。在这些罢工斗争的基础上，李大钊领导建立了“工人同志会”，这个组织，就是后来五卅运动中的“北京工人雪耻会”的前身。在“工人雪耻会”的基础上，1925年11月，又成立了北京总工会。

在恢复发展工人运动的同时，李大钊领导北京党组织再次开展在郊区农民中的工作，芦沟桥一带就是当时的宣传据点之一。

紧接着，党在学生中的工作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壮大了，并动员了大批学生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

1925年间，党在北京成立了第一所区委党校，有学生近300人，经过短期培训后派往各地工作。李大钊对这个为党和革命培育骨干的工作很重视，常常亲临指导。

李大钊对北方区党委的工作几乎倾注了全部的精力，他对党的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他从过去着重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研究和宣传，进而专心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与策略，他和青年同志在一起，为了讨论问题或处理工作，常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对于党的重大决议的贯彻，必定亲自检查真正带头参加，他一贯提倡要有一种“求真的态度”，认为“这种求真的态度，熏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的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作”。其实，这也正是他本人工作态度的写照，他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在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领导下，进一步加速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步伐。1925年以后，北京等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猛烈发展起来，直到1926年“三·一八”以前，群众的集会、游行、请愿、示威，一个接着一个，一浪高于一浪。每月的大小群众集会总在4次以上，每次参加的人数，多者达数十万人，少的也在1000人以上。在北方其他地区，也掀起了群众运动的高潮。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倾向进步，把他的军队改称为国民军，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家大计。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毅然抱病北上。

但当孙中山于1924年12月到达北方的时候，段祺瑞已经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总执政。这时的冯玉祥已受到张作霖和段祺瑞的排挤，到西山“养痾”，和孙中山打交道的已经不是冯玉祥而是段祺瑞了。段祺瑞一方面发表宣言，声称“外崇国信”，实际上是取媚于帝国主义，反对取消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宣布要开善后会议，借以反对国民会议。分明是在同孙中山针锋相对，把孙中山气坏了。当段祺瑞派人到天津去迎接孙中山时，孙中山加以严厉训斥：“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由李大钊负总责的中共北方区委，坚决发展“废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坚决支持孙中山，联合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和奉系军阀。12月24日，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规定会议完全由军阀、官僚等当官的和拥护这些当官的人组成，代表人民的人一律不能参加。共产党立即指出其反人民的性质，孙中山也通电指责。为了对抗善后会议，我党决定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反动的善后会议于1925年2月1日开张，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于3月1日开幕。反动的傀儡会议由段祺瑞牵线指挥，有时吵吵嚷嚷，有时冷

冷清清，都是为了争权夺利，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革命的代表会议由李大钊领导进行，开得很认真，很有生气，出席和列席的代表共200余人，工人、农民、教职员、学生、记者、律师和民族资本家等都有代表参加，代表了20余个省区，120余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大家热烈发言，着重揭露善后会议的反人民性质，同时，也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些决议基本上接受了党的主张。这样的会议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就在会议进行期间，孙中山先生于3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我党趁孙中山逝世，在全国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宣传运动。北京的党团组织，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在追悼孙中山的3天活动中，发动了30万人参加，散发了3000多份《政治生活特刊》，着重配合当时的国民会议运动，大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孙中山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政治主张。这些宣传，对满怀悲愤的人们很起作用。当孙中山出殡那一天，10多万北京人民为他送丧，事实上形成了一次反帝、反军阀和反段的群众大示威，队伍经过西华门时，由于对段祺瑞和善后会议的痛恨，愤怒的群众把挂在那里的善后会议牌子给砸毁了。

孙中山逝世后不久，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从此，由1924年逐渐高涨起来的中国革命运动，达到了它的最高潮。“五卅”运动，波及全国，是五四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在广东，因为是革命根据地，运动发展比较顺利，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在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在北京，虽然是反动军阀统治的中心，但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赵世炎等人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将各阶层人民组织了起来。当上海工人、学生遭到帝国主义屠杀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学生立即组织“沪案雪耻会”，以为声援，并加强了各校学生联合会的工作。接着，工人组织了“工人雪耻会”。6月3日，举行了5万余人参加的反帝示威，6月5日，480多个人民团体联合成立了“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反帝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涨。6月10日，在天安门前，20万群众，不顾炎炎烈日，举行了盛况空前的“五卅”运动中第一次“北京国民大会”。党对这次大会进行了细致的组织工作。会场搭起5个讲台，同时进行演讲、发言。与会者悲愤交集，群情激昂，“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援助被害同胞！”“救国救民坚持到底！”等口号声响彻云霄。当场有人血书“誓死救国”四个大字，表示决心。大会通过了《北京国民大会宣

言》，郑重宣告：“自惨杀发生后，举凡一切不平等条约，即失其效力。中国国民，绝不承认其束缚能力。本国政府，即应本此民意执行。”这次大会在区党委和李大钊领导下，开得很成功。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天气骤变，忽下大雨，20万革命群众，在高度的爱国精神鼓舞下，冒雨游行20余里，一直坚持到底。6月25日举行的第三次游行示威，参加的人更多，连郊区的农民也赶来参加，总数不下30万人。

除几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集会外，在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党团组织还发动了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以及抵制英、日货的运动。北京学生的罢课，从6月3日直到9月8日，坚持了3个多月之久。工人罢工，则发动了在英国使馆、兵营中工作的员工，退出其使馆、兵营以至家庭住宅，不为那些帝国主义分子服务。同时，还组织了绝粮纠查队，发动群众不供给英、日人以食品货物和停止供应英使馆的水电。

为了扩大影响，李大钊还派赵世炎等到天津、唐山等地领导了那里的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海员工人罢工以及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和学生罢课。

五卅运动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运动。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的工作和群众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把启发群众反帝的觉悟放在第一位。他反复向群众指出：“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形，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入的结

果，中国全民族应该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作民族独立的运动。”五卅运动中，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使运动一开始就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而没有停止在惩凶、道歉、赔偿损失等枝节的要求上。仅工会这一期间发出的反对英、日等帝国主义的传单就有12万份之多，学生中也组织了各种演讲队、演说团共数百组，川流不息地到街头巷尾展开宣传活动，并把这些宣传扩大到市郊的广大农村。

“五卅”运动以后，全国的反帝国主义怒潮，并没有减弱下去，而是更加汹涌澎湃了。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帝国主义和段政府使出了召开关税会议，修订关税税则的诡计。这套诡计，果然使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新老右派都上了钩，但广大人民，在共产党指导下，对帝国主义不抱幻想，继续斗争。李大钊在“五卅”运动中就曾经指出：“反帝斗争会很持久”，要大家在思想上作好充分准备。果然，帝国主义通过关税会议向人民发出了新的进攻。为了引导广大群众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开展斗争，1925年10月7日，北方区党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联合发布了《告工农学生军士书》，根据人民的要求，提出了“关税自主”的口号，并把这一口号和废除一切不平

等条约的口号联系起来，同关税会议展开斗争。鉴于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还对关税会议抱有幻想，还想到这个会议里去争一个“关税自主”，李大钊通过进步团体和一些报纸刊物，在各阶层群众中对关税会议进行了广泛的揭露，亲自联络团体对关税自主问题举行了讨论会，并亲自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发表演说，为大家分析指明了帝国主义召开关税会议的真实意图，又在北大等校教职员中发起了要求关税自主的签名运动。《政治生活》连续发表了10篇文章，用大量事实，彻底揭露了关税会议的侵略本质。11月，趁关税会议开会之际，在全国展开了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的运动。

在展开宣传的同时，在关税会议开会前后，北京在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领导下，于10月10日、25日、26日、11月10日、22日举行了多次示威游行。游行群众高呼“无条件的关税自主！”“反对欺骗中国的关税会议！”“打倒媚外政府！”“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这些示威游行，都遭到了段祺瑞军警的野蛮阻挠和破坏，特别是10月26日、11月22日两次，与军警发生了激战，流了血。最后那次，“完全是一次巷战。”

为了在时机成熟时进行推翻段政权的斗争，区党委和李大钊又领导群众在组织上作了准备。还在“五

卅”运动期间，北大等校的学生就在党领导下组织了“学生军”，“讲求军事教育，以为领导民众武装起来，以革命的手段打倒帝国主义之准备。”以后，又在学生军的基础上组织了“北京革命学生敢死队”，在工人中组织了“工人保卫队”，农民中组织了“农民自卫队”，准备进行革命的战斗。

这个时期，奉系军阀在关内外都已丧失人心，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影响下，在国民军的秘密支持下，于11月23日在滦州倒戈，直向沈阳挺进。而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当时统治了北京、保定一带，群众已在五卅运动和关税自主运动中大大提高了觉悟。党和李大钊认为这正是在北京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良好机会，区党委召开了会议，决定发动一次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建立国民政府为中心的群众革命斗争。并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指挥这次革命行动。

11月28日，这场以推翻段政权、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革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李大钊亲自领导了这次重大的斗争。这天上午，徒手组织起来的学生敢死队和工人保卫队开始出动。很快，各种号召人们起来革命的标语贴满了墙壁，数十万张传单在人群中飞舞，屋顶上竖起了革命的红旗，迎风招展。到下午两点，神武门前已是人山人海，难以计数。群众队伍都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有总司令、副总司令等。前

边是学生敢死队，臂缠红布的工人保卫队，十分威武，中间是一般群众团体和市民，最后是看护队，大家手拿木棍等武器，在神武门前举行了示威大会，然后，就在李大钊亲自率领下，浩浩荡荡向段政府所在地前进。李大钊走在队伍最前面，领着大家高呼：“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建设国民政府！”“建设民众的武力！”“拥护广东国民革命政府！”“解散关税会议！”等口号。随即，群众包围了执政府，赶跑了警察总监，占领了警察局和邮电局。接着，群众队伍又转向段祺瑞住宅准备举行群众公审，驱逐这个卖国贼。

但是，事前与我方有约的国民军，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不但没有在群众行动起来后按时开进城来，共同占领北京，反而采取措施，保护了段祺瑞及其反动政府的安全。由于这是我们党领导的一次夺取政权的尝试，领导和群众都没有经验，特别是由于当时人民手中还没有枪杆子，因此，这次运动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然而，这次运动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勇气和对反动派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次日，即11月29日，李大钊又领导更多的群众，在天安门举行了国民大会，通过了“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

议”、“责成国民军，服从国民大会一切决议”等充满革命精神的决议案，继续鼓舞群众的革命热情，准备进行更大的斗争。会后，又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

这次革命虽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它使北京在两天内陷于无政府状态，给了反动军阀以沉重的打击，显示了革命群众的巨大力量。当时把这次革命称作“首都革命”，党中央和团中央特地在12月1日联合发布了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暴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给予很高的评价。

1925年末和1926年初，全国人民展开了反日、反张、反吴的斗争。共产党北方区委于1925年12月31日、1926年1月14日、31日，连续3次在天安门举行了大规模的、每次均有数万群众参加的反日讨张的国民示威大会。这些大会，都是由李大钊参加领导的。2月27日，又在天安门前举行了4万多人的反英讨吴的国民大会。瞿秋白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这些革命行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段政府的更加仇恨。这时候张、吴正积极准备联合进攻冯玉祥。3月12日，两艘日舰公然掩护奉系军舰运送军队在大沽口一带登陆，驻守炮台的国民军发觉后立即以旗语制止，日舰不理，于是国民军发空炮警告，而日舰即报以实弹轰击大沽炮台，致使国民军死伤1

0 余名，国民军奋起还击，将日舰驱走。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反而纠合英、美、法、德等八国公使，以国民军破坏所谓《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发出最后通牒，限 48 小时内答复。同时，各帝国主义的军舰 20 余艘群集大沽口，实行武力威胁。

大沽口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莫大的愤怒，3月14日，北京举行了30万人参加的反日大会。3月17日，李大钊亲自率领北京全市各学校、各团体的代表团100多人分别到外交部和国务院去请愿，要求段政府“驳复最后通牒”，驱逐签署最后通牒的八国公使出北京。但是，以卖国为能事的段政府，竟用刺刀回答了人民的要求，当场刺伤多人，揭开了第二天大屠杀的序幕。

3月18日，李大钊又亲自领导200多个社会团体，10多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会场上挂起了昨天请愿受伤代表的血衣，写着“段祺瑞铁蹄下之血”8个大字。李大钊是大会主席之一，他发表演说，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斑斑血迹，慷慨演说，无不使群众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当即一致通过了驳回最后通牒和驱逐八国公使等决议。

会后，又组织2000多人的请愿团，再次到执政府去请愿。在群众进入执政府门前的广场后，段祺瑞的军警就封闭了广场上仅有的两个出口，血腥的大屠杀随即开始了。军警用排枪，用刺刀、马刀，灭绝人性地射击砍杀群众，一时血流满地，惨不忍睹，死者47人，伤者200多人，这一天成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李大钊在请愿时，走在最前面，以致头部和双手负伤，并曾一度被捕，因回答机警脱险后，仍不顾个人安危，镇静地指挥和掩护群众撤退，直到枪声响过半个小时后，他才随着最后一批群众撤出广场。

“三·一八”当晚，李大钊立即召开党团会议，布置如何慰问伤者，追悼死者，如何揭露段祺瑞的凶残，把斗争坚持到底。惨案的第二天，北京各校都停了课，许多学校为死难烈士开了追悼会。3月23日，北京市总工会、学联等团体，联合在北大举行追悼大会，会场高悬“先烈之血，革命之花”8个大字。会上，有的爱国青年咬破手指，扯下衣襟，写下血的誓言。党中央为“三·一八”惨案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强调指出：“唯一的办法只有实际的行动。民众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

“三·一八”运动虽然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镇压下去了，但是，正如李大钊当时所指出的：“帝国主

义对中国民族的压迫，只有日益增加，故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只有从之而日益强烈……到处都有中国民众被屠杀于他们所谓‘秩序’之下的血迹，即到处都有中国民众反抗列强的斗争。因为对于压迫的还答，只有反抗，对于他们镇压我们的‘秩序’的酬应，只有我们反抗他们秩序的骚乱，这便是革命。”

第八章 精神不死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恐怖。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联合起来，疯狂地加紧了对革命的迫害，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当时，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布告：“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李大钊更是被张作霖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再被通缉。

这时，李大钊即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工作。

1926年3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京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兵营内。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李大钊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常有密探盯梢跟踪。但是，他仍通过种种方法，和北方各地的革命组织、革命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在他领导下，沉寂多年的兵营，一时成了北京革命运动活跃的指挥中心。外面虽是敌人的黑暗统治，里面却是热火朝天地开展工作，在这里活动的革命者最多时曾达300人之多。有的时候，日夜都有同志化了装，躲过敌人监视，前来请示汇报工作，一些进步青年，以至大学教授，也常来求教。李大钊总是尽量亲自接见他们，和他们谈话，并审阅各地送来的报告，

派出干部，发出指示信，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力量。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猛烈发展起来，在南方，展开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革命斗争。9月，国民军也在我党帮助下，愿以国民革命和扶助民众运动为职责，并配合北伐军，进军河南西部。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这时派遣大批干部和革命青年去南方，积极支援北伐战争。

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积极发展北方革命力量。仅北京一地，“三·一八”以后至1927年2月，共产党员就在敌人的疯狂搜捕和“讨赤”、“驱赤”的恐怖气氛中由300余人发展到1000人以上，不到一年增加了两倍多，共青团组织发展也很大，国民党员也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余人。

在革命力量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李大钊又联合北京各进步团体，组织了“左派联席会议”（简称“左联”），使进步力量在共产党的周围紧密团结起来，更加孤立了国民党右派。

在湖南等省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北方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李大钊和北方各级党组织派遣更多的同志到广大农村中去，在这些地方突破敌人的黑暗统治，扩大了原有的农民组织，建立了新的农民组织和农民武装，展开了新的斗争。

在敌人严密控制的城市，革命的刊物继续秘密出版，除《政治生活》外，北京各大学都出版了革命的秘密刊物，如北大的《烈火》、《新生》、《下层》，师大的《新华》，燕京大学的《努力青年》，农业大学的《农光》，法政大学的《新社会》，艺术专科学校的《街头之塔》等等。

李大钊继续为《政治生活》撰写了许多文章，他的《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一文，用确凿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右派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

李大钊总是紧张地、繁忙地工作着，当他本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行动自由的时候，他从不稍懈。他善于在黑暗中看到未来的曙光，善于在敌人不可一世的威风中看到他们必然覆灭的命运，看到人民的觉醒，在异常艰苦、险恶的环境里，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心。他的表姑曾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么？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么？”李大钊答道：“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墙壁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出来，没有关系！”他也

常对孩子们说：“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种下东西，收获的时候是多么的欢喜呀！他们忘记了辛苦，只有快乐。我们的革命也是一样，现在统治者虽然想尽办法攻击我们……我们是不怕的。我们要挺身和他们斗争到底。我们要用最大的努力把革命的种子撒得到处都是……等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我们会像农民把庄稼收回家来一样的快乐！”

但是，李大钊自己的处境却越来越险恶了。敌人进一步加紧了对北方革命指挥机关的监视与迫害。机关里的工友阎振三出去送信，没有回来；张全印一早出去买菜，也没有回来。他们都被捕了。李大钊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对各地的工作作了周密的安排，烧毁了重要的文件，还与同志们一起练习打手枪，准备应付最坏的变化。许多人劝他离开北京，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要走出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夫人赵纫兰也很为他担心，多次劝说，但他总是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

反动军阀终于下毒手了。

为了逮捕李大钊，敌人是费了一番苦心的。

他们不但派特务经常监视出入人员的行动，而且利用招工友的机会，派人伪装打入内部，用了3个月的功夫，把内部的一般情况弄得一清二楚。他们还逮

捕了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李渤海，诱使他叛变，进一步摸清了内部组织情况。然后，他们找当时任公使团团长的荷兰公使欧登科交涉，希望准其进入使区抓人。于是，各国公使开会集议。这帮帝国主义分子，一直把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视为神物，在“三·一八”前夕的大沽口事件中，还根据它来向中国提抗议，提最后通牒，但到这时却把它踩在脚下，竟公然允许张作霖的“安国军”派兵进入使区捕人，而且允许其头领在荷兰使馆内坐镇指挥。帝国主义的行径就是这样的卑鄙无耻。

1927年4月6日清晨，奉军及所谓“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悍然不顾一切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实行了疯狂的大逮捕。

这一天是清明节，天气晴朗，夫人赵纫兰带着小女儿散步去了，李大钊正在办公。忽然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声，好多人从围墙上跳进院子里来。

“什么？爹？”李大钊长女星华正在外屋看报，紧张地问他。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跟我到外面看看去吧。”在危难中，他毫不慌张，从抽屉里取出小手枪，便向

院里走去。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敌人在叫喊着。

紧接着，身穿灰制服、脚踏长统靴的宪兵们，穿黑制服的警察，胸系红线为记的便衣特务，蜂拥而入，包围了李大钊。他们拉出前些日子被捕的工友阎振三，要他辨认，这个受过李大钊教育的可敬的工人，只是简单地摇了摇头。从他那披散的长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来，不难看出，他已受过多次酷刑了。

“哼，你不认识吗？我可认识他呢！”为首的一个特务狞笑着，又命令他的左右夺去了李大钊的手枪。

敬爱的李大钊被捕了。

先后被捕的，还有范鸿、谢伯俞、谭祖尧、杨景山等共产党员，以及邓文辉、张挹兰等国民党左派。

这一天，张作霖军阀共逮捕了60名共产党人及各方进步人士。

李大钊入狱后，敌人用种种残酷的刑罚拷打他，折磨他，用竹签打进他的指甲缝里，最后竟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是，李大钊始终立场坚定，坚贞不屈，他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他在狱中写下的自述，回顾了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自豪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在自述中，

他还写道：“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可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在生死关头，临危不惧，舍身救人，准备用自己一个人的生命，去挽救多数人的生命。这种伟大崇高的人格，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敌人还多次组织法庭审判，妄图从精神上压倒和屈辱李大钊。法官们每次都杀气腾腾，手下的狗腿子们也一起威吓、吼叫。然而，屹立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不可辱侮的形象。连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李大钊受审时……态度从容，毫不惊慌。”“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

威逼不成，敌人又继以利诱。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前来劝降，拉同乡关系，讲了许多甜言蜜语，并用高官厚禄收买。李大钊一概严词拒绝，从容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贼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弄得这个张作霖最亲信的狗腿子、大名鼎鼎的“小诸葛”无言以对，狼狈而去。

李大钊在狱中虽备受酷刑，行动艰难，但他仍不倦地为一同被捕的难友讲解马列主义学说，尽力宣传共产主义，鼓舞大家斗志，赢得全监犯人的敬爱。

敌人把李大钊与其他“犯人”隔离开来，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停止过革命的宣传，那些看守的士兵以至于气势汹汹的警官都成了他的宣传对象。有的士兵被他那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所感动，自愿为他传送消息，甚至有的警官私下里也表示：“上边的命令，我们也没法子想，像李先生这样的人，我们是十分信仰尊敬的。”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李大钊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亲爱的党，仍然是他为之鞠躬尽瘁的革命事业。他的夫人及两个女儿与他一同被捕，但他“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据他女儿星华回忆，她和母亲、妹妹曾在法庭上见过他一次，“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脸上表情非常平静，似乎他的心并没有放在我们身上。”

李大钊的被捕，北方的同志莫不万分悲愤！尤其是北方铁路工人，提出了劫狱的口号，并组织了劫狱队。李大钊知道后，极力反对这种冒险行动，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

李大钊的被捕，也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学生、群众、教育界、学者、名流以至他的同乡，均

起而营救。京津“各报社评，皆暗为守常呼吁”，连反动报纸都不得不虚伪地赞扬他的学问、道德和人格。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5日，广州也发生了反革命政变，一时，东西南北四方，乌云滚滚，反革命的恶流涌上来了。蒋介石特“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为了博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为了和蒋介石握手言欢，张作霖自称是孙中山的旧友，不反国，只反共，于是决定杀害李大钊。

1927年4月28日，丧心病狂的奉系军阀，终于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反对，将李大钊与范鸿、谢伯俞、谭祖尧、杨景山、阎振三、张挹兰等20位革命者一齐绞杀。

李大钊拖着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的身体，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的目光，含着让人永远难忘的坚定的笑容，第一个昂首从容地走上绞刑台。就在这绞刑架下，在杀人的刑台上，李大钊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最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最后献出了自己宝

贵的生命。

李大钊被害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特地发表了悼念文章，称赞他是“最勇敢的战士”，将为中国人民“牢记不忘”。当时还是革命中心的武汉，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据后来何香凝回忆：“听到张太雷先生报告李大钊先生殉难的经过，我们都不能遏制地流下眼泪来。”无产阶级革命家、诗人陈毅后来的纪念诗写得好：

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

……

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

他的死，不只激励了当时正在艰苦中奋斗的共产党人，也引起了一切正直的人们对反动军阀更深的仇恨。在北方许多青年踏着 he 未干的血迹，参加到党的行列里来。国民军中，除先后在陕西、河南等地为他举行追悼会外，并全军带孝，向他致哀。广大的社会舆论也无不为之哀悼和痛惜，武汉的《中央日报》、南昌的《红灯周刊》等，都发表了纪念文章。

为李大钊营葬，也经过一场尖锐的斗争。李大钊的灵柩，一直停放在妙光阁浙寺内。1933年4月，我党通过李大钊的生前好友和北京大学的师生，发起

为他举行公葬。为公葬捐款的名流学者多达100余人，其中有鲁迅、李四光等。4月23日清晨，灵柩从浙寺出发，送葬的人越来越多，沿途并有不少的团体拦灵公祭。到达西单时，送葬的人流一眼望不到头，花圈数不清，挽联也数不清。高举在最前面的北京青年送的一副挽联是：

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
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送葬队伍喊起了“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唱起了悲壮的《国际歌》。队伍庄严地向前行进。

国民党反动派对李大钊及其巨大影响的仇视和恐惧，即使在他死去的第6个年头，也是有甚无已。当送葬的队伍行至西四时，便遭到了反动军警、特务的开枪袭击，并且，因这次公葬，被蒋介石的宪兵三团追究，几个月内，成千青年先后被捕，在北京狱内被杀害的就达400多人，文学家洪灵菲在这次血案中惨遭杀害。

虽然遭到半路袭击，但灵柩队伍仍继续行进，一直送到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时，我党送来一块刻着镰刀斧头的墓碑。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这块好不容易送

出城来的珍贵的石碑，代表了多少共产党员赤诚的心意。但在当时，它却只能与李大钊同埋于地下，而墓前竖立的却是刘半农书写的墓碑。

李大钊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写的文章不少。这些文章经过无数周折，直到1939才出版了一本《守常全集》。鲁迅先生在1933年为《守常全集》题记的文章中说：“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都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又说：“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叠叠的集子，不是已经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成了么？”鲁迅的评论多么精彩！历史是无情的，骗人的东西终将被人民抛弃，而真实的和真诚的作品，虽然并不完美，却将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李大钊的革命精神十分可贵。他一心为党，一心为人民，他为革命忠心耿耿，奋斗一生，他用自己的全部言行，最后用自己的鲜血来实现了自己的箴言：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